

The background is a detailed painting of a harbor. In the foreground, a small wooden boat with two masts is docked at a wooden pier. The water is dark with ripples. In the middle ground, a large wooden building with a balcony is visible. To the right, a tall white lighthouse stands on a small island. Another boat is docked further back. The overall atmosphere is calm and historical.

中外名人传记百部

ZHONG WAI MING REN ZHUAN JI BAI BU

波伏瓦传

北京圣碟科贸有限公司制作

世界名人传记

西蒙娜·德·波伏瓦传

X X X 编著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童年岁月..... | 002 |
| 第二章 | 良家少女..... | 010 |
| 第三章 | 大学时代..... | 018 |
| 第四章 | 结识萨特..... | 031 |
| 第五章 | 哲学教师..... | 045 |
| 第六章 | 爱情契约..... | 060 |
| 第七章 | 存在主义..... | 074 |
| 第八章 | 美国之行..... | 084 |
| 第九章 | 《第二性》及其他..... | 098 |
| 第十章 | 世界漫游..... | 110 |
| 第十一章 | 最后岁月..... | 122 |

第一章 童年岁月

蒙巴那斯是法国巴黎第十四行政区，地处塞纳河左岸的西南角。对巴黎这座古老的城市来说，在塞纳河左岸，则以拉丁区和蒙巴那斯区最为著名。拉丁区又被称为大学区。法国一些主要的著名大学都建于此，如索尔邦大学、法国综合工科学院、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巴黎医学院等。而蒙巴那斯区则是巴黎这个大都会的艺术和文学中心。因它与拉丁区毗邻，加之环境优美，位置优越，自19世纪后期以来，拉丁区的许多文人、教授、学生纷纷迁居于此，到了20世纪初，这里已逐渐成为巴黎学者、作家、艺术家的聚集地。与此相伴随，在蒙巴那斯市区，谓之高雅的服务产业，磨坊、酒店、咖啡馆、夜总会次第开业，短时间内，就像多米诺骨牌，这些灯火喧杂之所不可胜数，这自然成为了此间巴黎文人、诗人、学生们休息、娱乐、聚会的理想场所。而那些道边露天咖啡座和酒店也几乎成为了蒙巴那斯的街景和标志。自19世纪以来，蒙巴那斯一直是法国巴黎最繁华、最著名的主要市区之一。

1908年1月9日，西蒙娜·德·波伏瓦出生

在蒙巴那斯大街 1 0 3 号的一幢简朴的小楼里。这一天她成了弗朗索瓦兹·布拉瑟和乔治·德·波伏瓦夫妇的长女。弗朗索瓦兹·布拉瑟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她是凡尔登著名银行家居斯塔夫·布拉瑟的长女。乔治·德·波伏瓦出身于贵族官宦家庭，他的父亲是塞纳省的省长助理，一生从事行政工作。乔治是这位行政官员的幼子。

弗朗索瓦兹和乔治的婚姻是他们各自的家庭极力促成的。在 2 0 世纪初的法国，财富与地位的联姻仍是理想的佳配。凡尔登大银行家通过给予这位可爱的长女一笔可观的嫁资，可以赢得乔治贵族老爷的尊敬。更重要的是藉乔治的贵族封号和官衔，可以给阔气的凡尔登家族带来无比的荣耀。而尊贵的乔治世家也并不讨厌结交这位令人羡慕的阔绰平民。因此，弗朗索瓦兹和乔治的婚姻在当时被看成是绝妙的珠联璧合。令人欣慰的是，在这桩契约式的婚姻中，两个既未相识又未经感情交流的青年并未鸿沟难越，而且能将情感逐渐升华发展，使婚后家庭生活相对平和融洽。这到底是出于萌发于斯的爱情萌芽，还是应归功于弗朗索瓦兹的年轻美貌和可观的嫁资，总之婚后一年，长女西蒙娜的降临人间，本应给这个未经炼石而搭砌的婚姻小巢以锦上添花的。然而这个不走运的小天使——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到来人间之时，正赶上一

场突如其来的家庭悲剧。小天使的外祖父、凡尔登大银行家居斯塔夫·布拉瑟先生在激烈的金融竞争中失败，被迫宣布银行倒闭，从而步入后生的穷途潦倒生活。银行家的破产和被捕严重地损害了弗朗索瓦兹和乔治两大家族在社会上的形象，同时也意味着改变了刚出生的小西蒙娜·德·波伏瓦此后的生活道路。

弗朗索瓦兹和乔治婚后就搬迁到了蒙巴那斯大街103号，开始了他们的独立生活。所谓新家是一个出租的寓所，位于一座简陋的小楼上，总共才有两个卧室和一个客厅。虽然有阳台，但不宽敞，好在房中设施还算完备，又地处蒙巴那斯繁华区，但无论如何，这样一所公寓是绝对无法与他们各自儿时所长大的豪华漂亮的殿堂比拟的。婚后弗朗索瓦兹自然成为了一名家庭妇女，主要职责是料理家务，而乔治则不得不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

乔治选择律师职业并不是出于自愿。他从小兴趣广泛，尤爱广闻博记，而且聪明伶俐，求知好奇，因此多才多艺，学习成绩也不错。但中学毕业后，在家庭的强制安排下，却进入了法律学院学习。乔治对家庭为他安排的这一生活道路并不满意，他表面上屈从于家庭的安排，然而在整个大学期间，他却很少去听法律课。为表示对家人的不满，他把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咖啡馆、赛马场和剧院里。戏剧院的后台更是他常

去和流连忘返的地方。乔治就是从这个时期起开始迷恋上戏剧的。而对戏剧、舞台表演的浓厚兴趣使他对学业所要求他必须完成的法律学习深恶痛绝。这一时期，他理想中的第一职业是当一名出色的演员。他认为只有这一职业才是远离世俗名利的高尚职业。基于此，他很自然地将极大热情投入于戏剧艺术，而将法律学习当成了必须完成的副业。然而事与愿违，从法律学校毕业后，乔治又不得不进入了父亲的朋友阿尔封斯·德维尔开办的律师事务所，担任秘书。对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乔治仍十分厌倦。虽然在婚后，迫于生计，从道理上，他勉强接受了这份工作，但他始终没有把整个心思放在法律事务上，从心里也未将律师作为自己终生的职业。因此，一有机会他就在戏剧和法律之间作选择，长时间地在两者之间徘徊。

弗朗索瓦兹在婚后不久就发现了丈夫这一好逸恶劳、不切实际的弱点。她本是一个心高志大的女子，原本期望丈夫能依仗早期受到的良好教育，专心致志地干番大事，或能像自己父亲早年那样功成名就。然而现实中的乔治却只是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纨绔子弟。对丈夫前途的无望和对婚姻的失意，加之父亲的破产，一度使新婚的弗朗索瓦兹感到心灰意冷。然而早期的教育，法国深厚传统观念的影响，及她本人贤淑的品性也使她对婚姻和家庭有很强的忍耐性和承

受力。虽然对婚姻家庭的不满足感，对新婚丈夫的失望感时常萦绕在她心头，但她仍默默地敬重他。特别是父亲破产后，为了丈夫的名誉和事业，她情愿远离家人和亲戚，而专心于料理家务。由于她宽容、贤德的品性和善于持家理财，即使婚后的家庭完全没有了进项，但在弗朗索瓦兹的精心安排下，家庭生活也被安排得井井有条。即便是在战争期间，这个家庭的小舟仍然能在平稳祥和的气氛中安然济渡而未受致命的颠簸。

长女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出生不能不说确实是弗朗索瓦兹一生中的大事，初为人母则标志着进入人生的又一驿程。随着女儿的逐渐长大，弗朗索瓦兹从这个在相貌上极像她的孩子身上好像看到了自己过去的影子。于是童年那舒适华丽的家庭，那高贵优雅的生活，那受人恭赞的漂亮女孩，那令人骄傲的良好教育，以及在少女时代对未来生活的热切憧憬，都余烬复燃般地漫漫于她久受压抑的胸中。她要让西蒙娜成长为她所希望的女子。她要让西蒙娜替她去实现那难圆的梦想。她要在女儿身上倾注全部精力和爱。自此弗朗索瓦兹遂将主要的精力和时间都花在对小西蒙娜·德·波伏瓦的教育和培养上。她对此长女寄予的厚望是如此之深，以致于对后来出生的次女海蒂娜来说，一直认为妈妈对姐妹俩的关注是实在不公平的。

小西蒙娜·德·波伏瓦聪慧、美丽、天真、活泼，集父母之优华于一身。她相貌上的美丽，性情上的乖巧来源于母亲的遗传，而聪明的天赋，性格中好动、倔强的一面又秉承于父亲乔治。她很早就显露出了其特有的天赋，3岁时能读懂一些儿童读物，5岁半时就进了阿德利娜·德西尔学校的学前班，7岁时就开始了编写儿童故事的尝试。她曾创作了《玛格丽特的烦恼》和《傻瓜一家》两个习作。而对此，母亲弗朗索瓦兹则更是一刻也不放松地对她进行培养教育。母亲除让她完成功课以外，还培养了她多种爱好，如教她学英文和钢琴。在母亲的严格管束和要求下，西蒙娜在学业上以及各方面均显露出出众的才华。这使她在整个童年时期看起来要比一般同龄的孩子显得早熟。

固然，小西蒙娜童年时期长足的进步，直接得益于母亲弗朗索瓦兹的严格培养，但无论如何也不该忽视其父亲乔治所营造的家庭气氛和他秉性深处给她带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随着西蒙娜的长大，乔治早期对戏剧的迷恋，对艺术的兴趣和热情并没有随岁月的流失而减褪。他常常把自己的寓所当成临时戏剧舞台，常邀请戏剧家、演员来家里聊天谈戏，甚至他还经常给妻子女儿背诵戏文，给她们上朗诵课，教她们走台步，指导她们化妆，或者干脆邀请来戏剧爱好者到家中来排练。这就是小西蒙娜逐渐成长起来的那种特有

的氛围。

自西蒙娜出生后，她家庭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父亲乔治应征入伍，西蒙娜一家在经济上顿陷窘境。战争结束后，整个巴黎经济萧条，物价飞涨，生活用品匮乏。波伏瓦一家为了节约开支，不得不从蒙巴那斯大街103号搬出，迁居到租金便宜的雷恩街71号。这使西蒙娜·德·波伏瓦从记事起，就亲眼目睹了家庭的窘况。雷恩街71号那阴暗狭窄的房间、母亲因劳累而日渐憔悴的面容使她深深感到了受贫困煎熬的滋味，而贫困也给她天真的童年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是，即便是经济最拮据的日子里，这个家庭也不乏欢乐的气氛。因病提前退役的父亲乔治常常在最困难的时候，在妻子和两个女儿面前朗读莫里哀、雨果的剧本。他始终在家中营造着一种欢乐的气氛，这种气氛以及他那与生俱有的富于幻想、乐观、通达的性格深深地感染着家庭中的每一位成员。因此西蒙娜·德·波伏瓦很小的时候，就把父亲视为伟人，她十分崇拜父亲，敬佩他的豁达，欣赏他的才能。而父亲对戏剧的爱好，也给她的童年生活带来了无尽的欢乐。西蒙娜后来在回忆自己的童年岁月时，曾由衷地感叹到：“我的童年真是太幸福了。”艰苦的岁月中，母亲弗朗索瓦兹不仅在学业上给了小西蒙娜严格的教育和培养，更重

要的是在做人和品德上给了她深厚的影响，为西蒙娜·德·波伏瓦此后的人生道路奠定了相当重要的基础。作为一个性格倔强的母亲，弗朗索瓦兹以她那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博大的宽容的胸怀支撑着家庭。为了家庭、丈夫和两个女儿，她不吝惜自己的容貌、体力。为了两个女儿的成长，她宁愿承担起全部的家务而不让子女为此分散精力。她时常告诫女儿们：“德行、文化比财产更重要，一个人只有在精神上完美，才是最完美的人。”母亲的奉献和辛劳，坦荡无私的品行和为人，以及对她的谆谆教诲，对小西蒙娜的整个童年一直发生着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正是在这种家庭氛围的影响下，西蒙娜·德·波伏瓦从小就养成了热爱读书、重视读书的习惯，而这一信念也几乎贯穿了她的一生。

第二章 良家少女

在法国，对女子教育的重视并不是由来已久的。在19世纪以前的法国，对女子教育的必要性、教育方式和途径的争议还十分常见。出于保护女子贞操的观念，女子教育一直未能走向社会化。因此，19世纪中叶以前，女子教育的途径、场所一般都是家庭规定的，而不是社会提倡的。当时，女子教育主要有两条途径，一种是家庭式教育。家长出面，为女孩子选择、聘请一些家庭教师。这种教育几乎是封闭式的，女孩子们足不出户，在家中接受一些有关社交、礼仪方面的训练和教育。在当时的法国，在上层社会里，这种教育方式较为流行，而且往往都是被一些贵族或中上资产阶级家庭所采纳。因为它能在最大程度上满足家长的需求，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因材施教，但费用较为昂贵，一般来说，只有财力比较雄厚的家庭才能采纳这种教育方式。另一种是修道院式的教育。在法国，这是最古老、最具传统的女子教育方式。家长们往往把修道院视为寄宿学校，他们花费一定的费用，把女儿送进修道院，少则一年，多则五至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一般来说，家长把子女委托给修道院后，

就不再过问，事实上也无权过问具体的女子教育问题了。一切教育的内容、安排、规划均由修道院制定。而那时的修道院，一般来说，对女子所进行的教育则往往仅涉及一些宗教教义的宣传以及一些家庭手工、技艺的传授。这种在当时法国较为普遍的教育方式，以其安全、简便、费用也不昂贵的特点，能为公众普遍所接受，而且尤其适合于那些中小资产阶家庭出身的女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人们也逐渐认识到，无论是家庭式的教育，还是修道院式的教育都不是较为完善、正规的教育。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女子缺乏受教育机会的不足，但它只能是一种补充。这种传统的教育方式最主要的缺陷是它没有一套系统化的、较全面的教育内容。它可以培养出温顺贤淑的女子，但不能使女子的素质、能力得到真正的提高。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法国的女子教育也面临着一场创新和变革。从19世纪中叶起，女子专科学校的创办，已标志着女子教育开始步入正规化、系统化的道路。但长期沿袭的传统习俗和观念也仍在对这些新式的教育施以广泛的影响。这些影响所表现出的诸如新式学校中，男女学生住宿隔离、分校授课等也说明了法国现代教育发展史上这一特定的历史特

征。这一时期传统的保守的观念和进取的追求个性发展的思想在同时交织地浸润着人们的头脑。

西蒙娜·德·波伏瓦的母亲弗朗索瓦兹·布拉瑟由于所处的社会、时代的限制，未能接受学校的正规教育。她的早期教育正是在罗瓦诺修道院完成的。传统的修道院式教育塑造了她忍耐、消极、沉静和克制的性格，但另一方面也对她坚韧不拔的毅力，对待生活的信念，以及对那不甚和睦的婚姻的承受力的形成无不产生一定的影响，使她在两个女儿心中树立了传统的特有的形象。

与母亲不同的是，西蒙娜的早期教育却走上了另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1913年西蒙娜·德·波伏瓦以五岁半的早龄进入了阿德利那·德西尔女子专科学校学习。这是蒙巴那斯区较有名气的一所正规女子专科学校。该校创办于1853年，在20世纪初，这所女子专科学校虽尚不能与当地的贵族名牌寄宿学校圣洛蒂尔德女子学校相媲美，但它却已成为一所设有小学、初中、高中的正规学校，且以主要招收中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女子而闻名。波伏瓦从1913年直至1925年一直在这所女子专科学校里就读。在这里她念完了小学和中学，并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中学毕业的最后考试。

德西尔学校的百科全书式的教育奠定了西蒙娜·

德·波伏瓦一生的基础。由于这是一所法国大革命后创立的新型学校，其创办宗旨是要突出不同于传统式的女子教育的新型特点，即重在传授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新知识。因此这个学校里普遍重视综合学科，其学校的教育风格也是资产阶级式的。西蒙娜·德·波伏瓦在这里接受了较为系统而全面的教育。她本人在读书期间更是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知识。她对各门学科都有浓厚的兴趣，她好奇心重，有极强的求知欲。而且在这样一个开放的学习环境中，其天性得到了一定的发挥。加之母亲弗朗索瓦兹的不断督促和悉心引导，使她在这段时间里，尤其是在学业上，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在阿德利那·德西尔女子专科学校的早期学习期间，西蒙娜·德·波伏瓦的聪颖、好学、兴趣广泛的天性就已开始显露。由于其热爱戏剧艺术的父亲乔治极其重视对女儿早期智力的开发，所以使得西蒙娜在小学、中学学习期间要显得比一般同龄的孩子出众得多。她的智力、理解力远远超过了同窗的伙伴，并常常因为智慧出众而使得一些自惭形秽的伙伴们不自觉地疏远了她。她为此也感到孤独和苦恼，然而在强烈的求知欲的驱使下，她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阅读上。由于早年时期受父亲的感染，在她聪明活泼、倔强的性格之中，也溶入了沉静、敏感、好幻想、爱孤思的

成份，尤其是对文学艺术，西蒙娜也不自觉地产生了一种情有独钟之情。这种情感体验，很自然地使她把阅读看成一种崇高的冒险活动，是一种可以从中获得新的体验和乐趣的行为。她通常能在阅读中不受周围环境的侵扰，能充分集中注意力，很快进入绝对状态。而这种阅读习惯的养成对其一生来说都至关重要，并成为她后来事业发展的前提条件。阅读习惯还对她的个性发展也起到了良好的作用。那种在阅读中须保持高度的稳定、宁静的心态，以及在集中注意力时所需要的毅力和耐心，强化了她独立、自制的意识。

在德西尔女子学校读书期间，西蒙娜渐渐明白了自己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当时的波伏瓦一家，已经走在了下坡路上。外祖父早已破产，虽想重振家业，但几次尝试却均告失败，实已无望东山再起了。父亲乔治在一战期间去服兵役，上了前线，后因病而退役。他退役后回到巴黎，先后在几家报社、杂志社找到一些临时性的工作。这种工作只能使他勉强维持生计，也许正是出于对文学艺术的爱好，才使他得以安于这种生存环境。家庭经济的拮据，使得弗朗索瓦兹和乔治只得把女儿的前途、出路寄托在她们的学习和读书上。乔治曾提醒过还在读书的长女西蒙娜，他们无法给予女儿嫁资。所以，他也曾严厉地对西蒙娜说道：“你必须工作，否则甭想结婚。”母亲弗朗索瓦兹对

两个女儿的前途更是忧心忡忡。她和乔治一样，都认为女儿们必须努力学习，靠自己的努力去获得经济上的独立。这种想法在当时是出于迫不得已，但却是这个家庭中的唯一信念。

西蒙娜·德·波伏瓦不仅明白自己的处境，而且也更清楚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也许受热爱戏剧的父亲的影响，她对文学艺术深怀感情，而且她本人也深信自己在这方面所表现出的天赋和兴趣。在15岁时，她已认识到女人们在文学艺术方面是能够获得荣誉的。她坚信自己有这一才能。她不甘于像母亲那样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家庭主妇，她要超越平庸的环境，要超越母亲。从这一年龄起，她已发誓要当一个著名的作家。这个坚定的信念始终支撑着她，使她开始面对现实、面对人生，即便是家庭所面临的多种困难也未能改变她人生的信念。和父母一样，她认为自己的职业完全取决于学习的成绩和聪明的才智，她只能走个人奋斗之路，而别无他途。

尽管阿德利那·德西尔女子专科学校是一所具有资产阶级风格的学校，但终因脱生于浓厚传统观念的氛围之中，因此学校的生活仍几乎是全封闭式的。即使在战争期间，这种生活也并未发生多大的变化。西蒙娜·德·波伏瓦多年来，在这所学校中按部就班地学习生活着。这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良家少女耐心

地过着一种循规蹈矩的刻板生活，这是学校、家庭的环境迫使她只得选择的几乎是唯一的生活方式。所幸的是德西尔学校也并不是一潭死水。每个新学年，校园中总会出现一些新的面孔。这些新学生的到来，给了校园里的学生带来格外的好奇心，因为她们终归属于外面的“东西”。西蒙娜也从这些学生标新立异的装束和假小子般的发式变化上敏感地捕捉到时代的气息和社会的风尚变化。

20世纪初叶的法国社会正处于一个人们思想观念产生深刻变革的时代。女人们也渐渐地从繁杂的家务劳动中摆脱出来，纷纷参加网球、高尔夫球、飞行、滑雪和汽车等项运动。习俗风俗的改变也给法国的女子教育带来了新的变化。各种宣传自由主义和个性解放的书籍在德西尔学校的女中学生中间成为了热门话题。这时的西蒙娜再也不顾母亲的警告，偷偷地阅读起布尔热、都德、普雷沃、莫泊桑、科莱特的作品。这些作品所宣传的主情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深深地感染着她，同时也渐渐地激起了她对传统的宗教观念以及女子专科学校中一些陈规陋习的不满。20年代，德西尔学校的女生仍被要求身着拖地的长裙和灯笼袖的短上衣。为此，西蒙娜曾在校刊上发表文章，嘲笑校方观念上的迂腐和保守。她还指责学校的教师才疏学浅。她这种公开表达了对校方不满看法的做法，引

起了个别教师对这位尖子学生的反感。但对此，西蒙娜·德·波伏瓦似乎满不在乎，她甚至毫不在意被取消优秀奖的资格。从中学时代起，西蒙娜已显露出我行我素、桀骜不驯的个性。

西蒙娜少年生活的时代正是法国社会生活由传统向现代迈进的转折时期。虽然在这一时代，法国的女子教育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但深厚的传统观念和习俗仍在制约着女子教育本身。其中较突出的是，女子基础教育方面仍存在着许多问题。由于对诸如女子出路、女子职业的选择等问题在认识上仍存在着许多偏差，所以女子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尚存在着目标不明确的问题。德西尔学校在女子教育方面仍受着许多传统观念的影响，所以它在某些具体做法上仍表现出因循守旧的特点。而西蒙娜从中学时代起就关注起自己未来的出路和前途，表现出强烈的自主意识。因而她也很早就意识到现实中的一切陈规陋习与她个性追求的矛盾，从而不自觉地起来反抗这些束缚她的因循守旧的偏见。在这个循规蹈矩的资产阶级良家少女的身上，已隐含着十分可贵的现代意识和反抗精神。正是这种现代意识和反抗精神，使她在以后的生活中，敢于冲破一些陈腐的偏见，敢于执着地追求自己的理想。

第三章 大学时代

1925年，西蒙娜·德·波伏瓦在17岁时，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中学毕业考试，并考入了巴黎大学，即索尔邦大学。从德西尔女子专科学校毕业后，波伏瓦一直曾梦想当一名作家。然而此时她必须面对的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选择。对西蒙娜来说，眼前最现实的问题并不是如何实现作家之梦，而是如何才能尽快地获得一个稳定的职业，从而实现经济的独立。因此经过反复慎重的思考，她决定选择中学教师的职位。中学教师的职业在当时看来，被普遍认为是一种最具安全感的职业。对西蒙娜的这一选择，其父母并未予强烈的反对。一方面他们能够理解女儿的这一选择，另一方面父亲乔治一想到女儿将成为一名中学教师，则总觉得有失他的脸面。在他看来，女儿的出生已是他一生不得志的标志，如果西蒙娜是个男孩，那么此时他一定会力促其报考巴黎综合工科学校，从而在将来成为一名实业家。而作为女子，则只能报考师范学校，只能选择当教员了。在法国，任何欲申请教师职位的大学生都需要参加若干次考试，并获得教师资格考试的合格证书，才能有资格获得一个职业。这

在乔治看来也是难以接受和有失身份的事情。到现在为止，他总还是认为凭借女儿的才能，她至少应该成为一名艺术家或其他什么奇才的。但西蒙娜却对他们那些不着边际的诸多想法不予理睬。她是这样一种人，一旦坚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那就会义无反顾地埋下头去做。在她的性格中，优柔寡断是很少出现的。她总是先认定某个目标，然后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向此目标一直走下去。

西蒙娜·德·波伏瓦考入巴黎大学后，在父亲的建议下，决定首先攻读文学、数学和哲学三个学士学位。她甚至还想攻读法学学位。她之所以如此选择大学的专业，并不只是简单地以获得文凭证书为目的，相反而是更多地出于一个女子对将来职业选择的考虑。对波伏瓦来说，选择自己喜爱的专业固然重要，但多一张比较实用的文凭，毕竟对将来的择业会多一种选择的余地。为此她不得不对即将开始的大学学业作综合的慎重选择。由于西蒙娜给自己定的目标太高，对自己的要求太苛刻，因此，要想获得这些文凭，就只有靠更多的辛劳和加倍的汗水了。

在1925—1929年间，西蒙娜·德·波伏瓦先后在天主教学院听普通数学课，在纳伊私立师范学校听文学课，在巴黎大学主修哲学、心理学课程。几年间，她如同穿梭般地奔波于这三所大学，投身于

紧张的学习生活之中。为了尽快完成学业，她为自己制订了严格的学习计划和作息时间表。她为此立下的誓言是“决不虚度此生”，并时刻用来激励濒于疲惫的自己。为了挤出更多的学习时间，她一方面节省和压缩睡眠时间，尽最大可能地减少盥洗时间，甚至要取消下午打网球的惯例。另一方面，她坚持自律原则，从不把时间浪费在闲聊天和娱乐上。她清楚地知道，要完成如此庞大的学习计划，就只有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学业上，并严格按学习计划安排的进程，去一步步地做下去。因此她几乎完全过着一种“圣徒”式的生活。学习的过度常把西蒙娜累得精疲力竭、头昏脑涨，但她却将此视为锻炼自己坚强意志的良好方式。每至疲惫之时，她总是要想一想自己的宏伟计划，并感到充满豪情、信心倍增。她常自豪地把自己比作一辆加满燃料的火车头，尽管身着重负，但却昂首呼啸着，竭尽全力地向目的地冲刺。正是在这种与自我意志较量式的学习中，西蒙娜终于尝到了超越自身局限性的快乐。也正是在这种高强度、超负荷的学习中，波伏瓦终于得以提高了自己学习和工作的效率。通过种种切身的体验，她终于真正地认识到了人的意志、毅力是完全可以经过锻炼和磨练而得到提高的。

作为一个女性，在当时的社会习俗和生存条件下，西蒙娜本可以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和人生道路。至少

她完全可以像她母亲弗朗索瓦兹那样，过一种平和、安逸的生活，做一个受人尊敬的家庭主妇。这在当时既是一种为社会允许，为公众接受的生活方式，也是被绝大多数妇女所采纳的人生道路。然而这对西蒙娜来说却是绝不可以接受的。她实在不甘于像她母亲那样做个平庸的角色，度过无味的一生。她坚信，通过艰苦的努力、奋斗，是能够像许多出众人物那样，取得成功。正是基于此信念，她毅然地选择了一条荆棘丛生的学者之路。而这种选择的确需要一种英雄主义的气概和当时被认为只有男人才具有的钢铁般的意志。在20世纪初的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像西蒙娜·德·波伏瓦这样作出如此人生选择的女子也确不多见。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波伏瓦所走的是一条代表新时代女性的人生道路，从而使她成为了20世纪西方新女性的楷模。然而在这条重视走向社会，注重献身于事业，摒弃一味固守家庭的现代女性之路上，布满的是残酷的生存竞争和严重的性别歧视。作为冲向这条路上的排头兵，面对即将参予的与男人激烈竞争的竞技场，西蒙娜·德·波伏瓦清楚地知道，等待着她的更多的绝不是荣誉和荣耀，但她是不会退缩和回避的。

西蒙娜在纳伊私立学校听文学课时，结识了两位教师。一位是梅西埃小姐，她在35岁时就取得了哲

学的学衔，并获得了教师资格证书，她的风度和学识令西蒙娜折服。西蒙娜曾把梅西埃小姐视为自己的榜样。受其影响，她也立志献身于哲学。另一位是罗贝尔·加里克教授。他热情开朗，热心于社会活动。有感于广大民众尚缺少受教育的机会，罗贝尔组织起了为贫民区的工人义务讲课的大学生团体。西蒙娜深受加里克教授的热情和行为的感召，在学习之余也挤出时间积极参与了这个讲课团体。她每周为巴黎贫民区的工人们上一堂法国文学课，但也从中发现，这种社会性讲学收效甚微。从这一社会实践中，西蒙娜认识到，知识分子的行动应在于着眼那些思想观点的创新，而不是类似这般的街头巷尾的宣传和鼓动。但另一方面，这种与社会生活的初级接触也开阔了她的眼界，使她更加明确了自己所肩负的使命。西蒙娜在纳伊私立学校听文学课的期间，为了完成学业，也阅读了20世纪法国作家的许多作品。这些书籍中，她尤其爱读纪德、克洛岱尔、莫里亚克、普鲁斯特的作品。这些作家的作品都能从不同的方面启发西蒙娜思考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等问题。而且这些作品所表现出的否定资本主义文明传统的反叛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波伏瓦的思想。可以说在波伏瓦的一生中，真正开始关注社会问题，开始对一些严肃的人生问题进行科学性的思考，正是起于这个时候。

本世纪20年代的最后几年是法国社会发生变革的重要时期。一战期间，法国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曾饱受了沉重的战争之苦。战争给法国社会带来了动荡和危机。人们对战后的社会现实普遍感到失望和不满。而与此同时，战后法国的意识形态却显得空前活跃，呈现出各种思潮迭起、文坛上革命不断的局面。这种反常的现象恰说明了人们不满现状，焦于危机，想摆脱自我困顿和精神萎靡的心态，也恰恰反映出社会公众那种急于探索，渴望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的躁动心情。这一时期，法国知识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出于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将许多外国剧作家的戏剧搬上了法国的戏剧舞台。这些反映现代思想观念的国外戏剧作品给法国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引起了思考的热潮。其中如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对社会旧道德、旧秩序的抨击，以及波兰戏剧家皮兰德娄的剧作对现代人自我困顿的探求，都给予了战后的法国人以极大的启示。无疑，这些异国剧作家的作品，在法国引起了一场思想观念上的震动。但是，这场舞台上的革命所呼唤和预示的更广阔的背景，却是一场波及整个法国思想界的，有如山雨欲来风满楼般的思想浪潮。面对当时法国社会上因循守旧者所要拼命维护和捍卫的正统观念和道德，戏剧这个文学艺术界的轻骑兵首先向法兰西

传统文化发起了冲击，因而也首当其冲地遭到了守旧派的猛烈攻击。而与这场舞台革命交相呼应的是代表法国20年代文坛旗帜的各种反传统的现代派文艺浪潮。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是流行于这一时期的较有影响的文学艺术思潮。这些新思潮高举反传统的大旗，目的就是要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来一场彻底的革命，以摧毁现存的价值体系和传统的思想观念。受这些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影响和新的文艺思潮的冲击，法国公众的观念，尤其是年轻人的思想观念开始发生转变。人们不再对传统的东西顶礼膜拜，不再恪守着旧的道德规范和习俗，而是急于要摆脱陈见的束缚，倾向于接受新的见解，确立新的价值体系。当然，在整个20年代中，绝大多数充任这场运动急先锋的是法国的青年人，他们更倾向于选择非道德主义，喜欢标新立异和打破陈规。而年老的一代人则更多的是对社会的剧变、年轻人的偏激和骇世惊俗的行为表现出不满和不理解。他们感叹世风的败坏、法兰西文化的衰败。

在20年代，思想领域的革命又在法国引发了一场小规模的女权运动。这场运动的发起人内莉·鲁塞尔先是支持其丈夫的内兄保罗·罗班在法国大中小学中向学生进行性教育的举措，此后她又同法国人口增长全国同盟进行斗争，反对政府把妇女变成生育工具的做法。她呼吁妇女起来斗争，提倡注重避免生育的

条件和寻求性的快乐，强调妇女应确立一种新型的性观念。但是内莉·鲁塞尔的努力在当时并未得到响应，而且她的行为还遭到了法国报界守旧派人士的抨击。人们指责她主张非道德，将妇女引入误区和歧途。但是综观20年代的法国，新旧思想的冲突和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文学革命的变革更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发展，也促进了人们思想上的解放。

不可避免的是，这场新旧思想的矛盾冲突与斗争也在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家庭里展开。1926年，西蒙娜年过18岁。作为巴黎大学的女大学生，在对社会诸多方面问题的认识上已有不少独特的见解。这些见解一旦在家庭中流露，就遭到父母惊讶的反驳，于是论辩就自然发生。例如父亲乔治对法兰西戏剧舞台上的新近变化感到不满，他尤其蔑视易卜生的戏剧。他认为易卜生使社会的道德退化了。而西蒙娜则认为易卜生指出了社会不健全的症结之所在，是绝对不容忽视的剧作家。在婚姻问题上父亲乔治认为男人有权“在婚约上捅几个口子”，而妻子却必须严守贞操。而西蒙娜则主张夫妻要绝对平等，相互尊重，双方都享有同样的权力。她极不赞成父亲这种男权至上的观点，在内心深处对父亲的这些观念及其所做所为已表现出强烈不满。正是基于这种明显的不满和无奈的悲哀，西蒙娜才在其以后的著名论著《第二性》中重点

抨击了父亲所主张的这种封建夫权的思想，呼吁妇女要自主地争取自身的解放。母亲弗朗索瓦兹尽管赞成女子应该接受教育，但她认为现代教育有不负责任的倾向，会使女儿误入歧途。而西蒙娜则与母亲的观点相反，她认为自己以前所受的传统教育，包括人们向她灌输的那些道德标准，存在着许多问题。两代人的争论常常相当激烈，双方都坚持己见，拒绝接受对方的观点。从这些争论中，西蒙娜·德·波伏瓦感觉到了父母的固执守旧，也意识到了两代人在思想观念上的代沟。

大学时代的西蒙娜正是在家庭式教育与社会式教育对女子的要求出现尖锐冲突的过程中开始了其思想探索的历程。她早年接受的德西尔学校的正规教育与其父母所期望的女儿应接受的教育出现了差距。大学初期，她在现实生活中常感到无所适从，不知该走什么样的生活之路。她朦胧中感觉到要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然而父母的叮嘱与劝告又使她陷入矛盾和困惑中。1925年至1926年，她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之余与表兄雅克有了密切的交往。通过雅克，她感受到了一种新鲜的东西。在蒙巴那斯，这个巴黎艺术中心，艺术家、知识分子最为超凡脱俗。他们为人们树立了自由生活的楷模。受这些人的影响，西蒙娜决定暂时抛弃自己圣徒式的苦行生活，享受一下自由生活

的乐趣，以便去了解社会，体验人生。这时，这位不满 18 岁的年轻女大学生觉得自己已经到了谈情说爱的年龄，于是她便悄悄地爱上了姨母的长子，这位 19 岁的表兄，雅克。雅克自父亲去世后，未能进大学读书，他继承了蒙巴那斯林荫道旁父亲遗留下的一家玻璃厂。雅克经常晚上来到波伏瓦家消磨时光，他特别喜欢与自己这位女大学生表妹聊天。雅克仪表堂堂，外表上也显得成熟老练，他似乎比西蒙娜见多识广。他在绘画上颇有天赋，常常追踪先锋派作家的活动。他还与超现实主义作家有交往。西蒙娜把这位见多识广、多才多艺的表兄视为自己的偶像，对他十分崇拜。而与表兄雅克的交往又使她有幸参观了巴黎先锋派、超现实主义作家的工作室以及观看他们的大型画展。雅克还向西蒙娜讲述了超现实主义作家的许多事迹和壮举，以及超现实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和争吵。当时法国巴黎的超现实主义者经常聚众闹事、捣乱示威。他们捣毁他们所厌恶的酒店、咖啡馆。他们发表抨击现存制度的文章。他们把自己视为社会的“破坏者”而不是建设者。他们试图打倒一切，摧毁一切，包括语言。西蒙娜在听表兄雅克向她描述这些事情的过程中，十分赞赏这些超现实主义者的愤世嫉俗和他们的反叛精神。从这些超现实主义者的身上，她似乎看到了未来的曙光。

1926年3月和6月，西蒙娜·德·波伏瓦通过了文学和基础数学的考试，获得了文学和数学的学士学位。但她对数学和古典语言文学不太感兴趣。纳伊私立学校的哲学女教师梅西埃小姐建议她去攻读哲学学士学位，并且准备大、中学教师的资格考试。在梅西埃小姐的鼓励下，西蒙娜决定攻读哲学学位。从1926年6月起，她开始泡在巴黎大学的图书馆里阅读柏拉图、叔本华、莱布尼茨的著作。经过刻苦的努力，她在1927年的大学课程考试中，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了基础哲学的考试合格证书。她的成绩令一同参加该科考试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莫里斯·梅洛·蓬蒂感到惊讶，后者遂与西蒙娜结下了友谊。正是由莫里斯的引荐，波伏瓦后来才结识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让·保尔·萨特。

1927年至1928年，西蒙娜·德·波伏瓦全力以赴地投身紧张的学习中。她准备参加哲学学士学位的考试。这一期间，由于与莫里斯的交往，她结识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左翼和右翼两派的大学生，并参加了他们的一些活动，这些活动增加了西蒙娜与社会接触的机会。1928年3月，西蒙娜·德·波伏瓦终于在巴黎大学毕业，同时获得了哲学学士学位，但与此同时，为了获得教师衔级的资格考试证书，她又一刻不停地开始着手准备，即刻冲向了下一个目标。

为准备这次考试，波伏瓦还特意请巴黎大学著名的哲学教授莱昂·布伦维克指导她攻读高等教育文凭。布伦维克教授给她出的哲学论文题目是《莱布尼茨著作中的概念》。

1928年是不平凡的一年，西蒙娜·德·波伏瓦要准备高等教育文凭的考试。这次考试的成功与否，将决定她今后的生活道路。而与此同时，波伏瓦与表兄雅克的关系也遇到了难题。雅克要去阿尔及利亚服兵役，临行前，因得不到母亲的同意，未能前往波伏瓦家求婚。因此他只能把西蒙娜约在德朗布尔街的斯特里克斯酒家作一临行前的告别。这次话别，雅克并未留下海誓山盟就离开了西蒙娜踏上远征的道路。雅克走后，西蒙娜仍继续按计划准备着高等教育文凭考试。但她为了继续体验雅克那种曾经令她倾倒的艺术家生活，经常独自光顾蒙巴那斯林荫道旁的酒吧。在酒吧里，她试图去体验另一种生活方式，体验与陌生人交往的感觉。然而独自去酒吧的冒险行动也给她带来了不少麻烦。她不止一次地遇上了流氓、无赖的纠缠，但最后都被她凭借着胆大和机敏，巧妙地脱了身，因而未受到丝毫的伤害。雅克走后没多久，西蒙娜有一次在酒吧里偶然听到一个漂亮少妇在抱怨雅克抛弃了她。从这位少妇的口中，波伏瓦终于知道了雅克的品行和为人，她的爱情幻灭了，她的偶像不过是

个凡夫俗子。爱情的幻灭使波伏瓦重新思考了自己的人生之路。是选择某个职业，成家立业，还是选择一个自由的环境，当一个四海为家的作家？波伏瓦举棋不定，但她认为，只有将两者结合，才是更好的生活之路。经历短暂的情感痛苦之后，西蒙娜·德·波伏瓦又投入了紧张的学习、复习中。在这最后的冲刺阶段，她决定全力以赴。她就是这样一种人，只要认清了目标，就会一往无前。

第四章 结识萨特

1928年11月至1929年5月，为了参加教师学衔的会考，西蒙娜·德·波伏瓦一边在巴黎大学听课，一边投入到紧张的复习考试之中。报考这次资格考试的考生为数不多，但在这些考生中，有一部分是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这些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都是她潜在的竞争对手，其中有保尔·尼让、让·保尔·萨特、勒内·马厄。在此之前，西蒙娜早听传闻，说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晚会上，萨特由于赤身裸体地跟在只罩了层遮羞布的尼让身后而引起了公愤。闻此恶作剧后，波伏瓦在印象中对让·保尔·萨特的行为很反感。她后来结识了这三个人中不爱出风头的勒内·马厄。勒内·马厄已经结婚，属于年长者，他经常为西蒙娜指点迷津。依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习惯，他还给西蒙娜起了个外号“小海狸”。西蒙娜后来回忆到“跟马厄在一起才真正找到了自我”。西蒙娜经常跟勒内·马厄在一起复习，准备学衔考试的论文。她对勒内·马厄有好感，但这种情感只能是友情。她不愿充当第三者，因为她是追求爱情的人。但与勒内·马厄的友谊却给她紧张的学习生活带来了

许多快乐。

1929年的学衔考试论文题目是《自由与偶然性》。西蒙娜·德·波伏瓦和尼让、让-保尔·萨特、勒内·马厄都全力以赴地准备着这篇论文。为了取得考试中的好成绩，西蒙娜在考试前夕这段时间常常废寝忘食，一直使自己处于一种全神贯注的复习状态。考试的日子终于来临了。西蒙娜在两天的笔试中发挥出色。考试后，父亲乔治为让女儿放松一下，便带西蒙娜去蒙巴那斯有名的酒吧欢度良宵。父亲还请她去著名的饭店吃煎蛋。在乔治的内心深处，他还是热切期望着女儿的成功，希望这种成功能洗刷掉他不得志的耻辱。而事实证明西蒙娜则从来未让他失望过。

笔试过后，考生们必须准备口试了。在口试前半个月，自负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生让-保尔·萨特就早已得知巴黎大学这位女高材生的大名。萨特对她颇有好感，更赏识她的才能，便通过勒内·马厄邀请她同他们一起准备口试。于是波伏瓦高兴地同另外两位高师学生尼让和马厄一道经常来到萨特的房间里刻苦钻研考试大纲，为口试作积极的准备。在准备口试的半个月期间，西蒙娜与保尔·萨特朝夕相处，只到就寝时才分开。跟萨特和他的同窗伙伴在一起，西蒙娜发现了时代的生活并非全部是单调枯燥的读书学习，还有丰富多采的一面。她白天与他们埋头于复习考试

内容的学习和准备，有时遇到某个问题，便向他们请教，与他们一起讨论。黄昏时分，她与他们一道去逛集市，去咖啡馆、酒吧闲聊，有时还与他们一起去看电影。在此期间，萨特对西蒙娜·德·波伏瓦表现出了东道主的盛情。他为人慷慨，常常倾其所有地邀请西蒙娜和其他同伴去酒吧畅饮鸡尾酒。有时兴致一来，萨特也不怕众人的讥笑，放开歌喉唱一些流行的爵士乐。萨特的为人和豪爽、幽默的性格让西蒙娜改变了以往对他的看法。萨特并不是她想象中的那种纯粹喜欢搞恶作剧的坏小子，而是个能给人带来许多快乐的“大活宝”。跟萨特在一起，西蒙娜觉得生活饶有趣味。萨特在这半个月的复习准备考试的日子里，对西蒙娜·德·波伏瓦也增进了了解，他非常欣赏这位满怀自信的女大学生，钦佩她敢于在思想领域与男人一争高低的气魄，他常常有意亲近她，常常把自己所写的作品拿给她阅读，让她了解自己的思想观点。而西蒙娜则愿意与萨特交流看法。他们常常对某个问题能达到共识。这种平心静气的思想交流从他们相识一开始就十分顺畅，使他们从一开始就在精神上能达到融洽，这一切将是他们今后关系发展的基础。

1929年6月，准备已久的教师资格考试的口试终于来临。西蒙娜和萨特在口试中，以同样的高分，获得了教师衔级合格证书。获得证书后的西蒙娜为了

要放松一下一直绷得很紧的神经，征得了家人的同意，决定乘小火车去利穆赞祖父的庄园度假。回首四年，为了要获得今天这个教师资格合格证书，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大学的学习中曾尽力拼搏，她的大部时间都是在伏案疾读中度过的。对书斋的苦行僧式的生活，她早已习以为常。何止这四年的大学生活，由于波伏瓦一家经济拮据的现实，西蒙娜很早就懂得，自己的一生，今后的一切，只能靠自己去奋斗，她必须为自己的前途考虑，凭借个人的努力寻找到一个职位。基于这一信念，她牺牲了少女时代几乎全部的娱乐和悠闲，把整个心血都倾注在学业上，甚至连“对镜贴花黄”的生活，她也只能去想象，去在梦中实现。而在现实生活中，她却无心刻意去装扮自己，她对自己的外表妆扮常常粗心大意，疏于雕琢，这种习惯一直到她中年以后仍未改变。今天，在获得了她梦寐以求的教师资格证书后，西蒙娜·德·波伏瓦和家人一样激动。在她看来，这个证书不仅给她带来一种安全感，一种能够得到社会认同的自豪感，是一凭借自己的努力奋斗而走向自立的标志，更预示着今后的独立生活中一种充满希望的前景。

从获得高等教育合格证书的那一天起，西蒙娜·德·波伏瓦就憧憬着自己光明灿烂的未来。在这大学时代结束的最后一个假期里，她决定要彻底解放一下

自己。到利穆赞去度假，去郊外荒野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到大自然中去体验诗意的生活，这正是西蒙娜眼下最最向往的。

临行前，西蒙娜把自己要去利穆赞的消息告诉了勒内·马厄和萨特。萨特闻知后，借口要进行写作，需要和他们在一起，也打算去利穆赞去和波伏瓦会面。而勒内·马厄则更是捷足先登，抢在了西蒙娜和萨特之前到达了利穆赞。波伏瓦家里知道了女儿要与一个已婚的男人和一个野小子去度假，当即拒绝提供旅费，阻止女儿前往。然而西蒙娜仍不愿放弃自己的旅行计划，于是向表妹玛德莱娜借了钱，便动身前往利穆赞。不久，萨特也到了利穆赞。而勒内·马厄则提前返回巴黎，好让萨特留下继续陪同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利穆赞，由于西蒙娜的祖父刚刚去世不久，因此西蒙娜就独自住在了祖父的庄园。而萨特则在附近的一家饭店里住下。波伏瓦白天常从庄园出发，穿过田野，去饭店与萨特见面，直到中午时分，才返回。萨特和波伏瓦俩人常常肩并肩去郊野散步聊天，他们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题，俩人常常就某个问题争论不休。在西蒙娜到达利穆赞四天后，西蒙娜的父母乔治和弗朗索瓦兹夫妇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两位年轻人的面前。波伏瓦夫妇彬彬有礼地请萨特离开此地，因为有人对“西蒙娜的行为”说闲话了。而萨特在受到如此冷遇之

后，并不在意。他并未当即表示要离开利穆赞。他向波伏瓦夫妇申辩，他们是在规规矩矩地讨论严肃的问题，他本人也不打算缩短逗留的时间。听完年轻的萨特的辩解后，波伏瓦夫妇无言以对，只得悻悻而去。而西蒙娜见父母对自己无可奈何，便越发大胆，继续在利穆赞与萨特约会。他们后来为躲避周围人的视线，便索性躲进栗树森林中，在那里继续他们的讨论。而西蒙娜与萨特的爱情故事也就从利穆赞的栗树森林的相处开始了。

与萨特的相识、相爱将在西蒙娜·德·波伏瓦的一生中写下重要的篇章。在西蒙娜的一生中，继表兄雅克之后，萨特是她最重要的恋人，也是她崇拜的偶像之一。

萨特出生在法国巴黎第十六区一富裕的资产者家庭。其父让·巴蒂斯特·萨特曾毕业于海军军官学校，后被派往印度支那。1904年，他34岁时，从印度支那返回巴黎，同年，娶了著名的德语教授克雷蒂安·夏尔·施威策尔的女儿安娜·玛丽·施威策尔为妻。安娜·玛丽·施威策尔当时年仅20岁。一年后，1905年6月21日，长子让·保尔·萨特诞生了。但几个月后一场病魔夺去了让·巴蒂斯特·萨特的性命。父亲去世后，幼小的让·保尔·萨特便随母亲搬回了外祖父家里。外祖父当时在巴黎创办了一所语言

学院，他本人在学校里专门从事语言教学和语言方法论的研究。让·保尔·萨特在外祖父家受到了良好的启蒙教育。外祖父家藏书丰富，这给了他以浓厚的文化的熏陶。正如萨特在后来的《文字生涯》中写道“我是在书丛中长大……我早在不识字的时候，就已经崇敬书籍了”。他四岁便开始读书，7岁时已经阅读福楼拜、拉伯雷、伏尔泰、雨果等人的作品。8岁左右能摹仿着编故事，被家人视为“神童”。他8岁进入蒙泰涅公立中学，后转入亨利四世中学。1916年他11岁时，母亲改嫁，他于是又随母亲搬迁到拉罗舍尔，在拉罗舍尔中学读书。让·保尔·萨特的继父芒希先生毕业于巴黎综合工科学校，他希望让·保尔·萨特以后能考入工科大学。但萨特则对母亲改嫁于芒希先生一直不满，因此他与继父的感情并不融洽。他性格倔强，自尊心强，更不愿受制于人，任人摆布。因此，1920年，萨特离开了拉罗舍尔，又回到了巴黎，继续在亨利四世中学学习。1924年中学毕业，此后他考入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这是法国一所久负盛名的一流学府，在这里他决心攻读哲学，此举也是萨特故意与其继父相对抗的一种情绪的表现。1928年，萨特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毕业，获得了哲学学士学位。1929年与西蒙娜·德·波伏瓦一起参加了哲学教师学衔会考，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了

教师资格合格证书。

萨特幼年丧父，加之外祖父和母亲的溺爱，使他从小养成了放任自流的任性、孤傲性格。他在公立中学读书时，就和同窗伙伴，后来成为师范学校同学的尼让一起酷爱搞恶作剧。他们常爱哗众取宠，上课做些怪相，引人发笑，因此在同学中是一对有名的淘气包、捣蛋鬼。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后，让·保尔·萨特仍不改其爱搞恶作剧的恶习。他经常自愿带头，戏弄刚入学的新同学，或给某个老师出些难题。他思维敏捷、反应奇快，且满脑子坏主意，很快就成为了师范学校学生中的小领袖人物。然而他给人更多的印象却是酷爱读书，涉猎广泛，学识丰富以及气质斯文、儒雅的一面。但是谁也不会将他视为书呆子一类的人物。正是因为萨特酷爱学习、聪明机敏、悟性高、擅长思辩，善写一手好文章，且写作速度奇快等特点，使他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期间，成了小有名气的人物。人们赞赏他的才能，也欣赏他洒脱、顽皮的个性。对别人的赞誉、恭维，让·保尔·萨特有时也不免自鸣得意。而他本人有时也颇为自负地评价自己的才能：“要达到黑格尔的水平？当然，这个攀登既不太艰难，又不太漫长。”由于其突出的个性，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四年学习中，他不免成为了人们议论的中心。当然，传闻最快的还是那些他一手策划的恶

作剧。早在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巴黎大学读书时，就常听到有关高师学校这个“风云人物”的故事，其中就有那个萨特在高师学生毕业晚会上赤身裸体的蜚闻。但当波伏瓦在毕业前夕，结识萨特，而真正与让-保尔·萨特及其伙伴们共处时，她才发现走到近旁的这位“传奇人物”实际上是一位不乏幽默、性格开朗、谈吐优雅的高等师范学校的高材生。这时她才觉得以往对他的成见是多么的幼稚可笑。由于这种对比效果，加深了她对萨特的关注和兴趣，通过此后的朝夕相处，她终于透过现象看到了萨特本质的一面，从而对他萌发了好感。在波伏瓦的眼中，透过萨特狂放不羁的行为背后，是率直、坦诚、执拗、怪癖，那种与她具有的极其相似的精神品质。

在利穆赞之行中，西蒙娜与萨特终于由相识发展到了相爱。对波伏瓦来说，与萨特的相爱激起了她从未有过的激情，但伴随着这一激情的产生过程，她也体验到了欢乐和痛苦。萨特是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他有纤细、执著、坦诚、儒雅的一面，也有易变、放荡、自私和虚荣的一面。他对于西蒙娜来说，是一个猜不透的谜。西蒙娜不知道该怎样给他定性归类，但她却被他强烈地吸引着。她把萨特视为自己梦寐以求的伴侣。她认为只有和萨特在一起，她才可能承受一切甘苦。然而在与萨特的热恋过程中，越走近萨特的

情感世界，西蒙娜却越悲哀地发现了自己并不是处在一个唯一的位置上。而萨特在从与她一开始交往起，就曾暗示她，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自由、平等的，他不准备向她承诺什么。面对这一现实，西蒙娜·德·波伏瓦只得去说服自己去承受它。她从自己父母那并不十分幸福的婚姻关系中认识到了，在爱情婚姻问题上，仅仅去遵循传统习俗和道德准则也并不一定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她曾目睹过在这种合法的婚姻关系掩盖下的欺骗、艳遇、私通。因此，她自己也渐渐赞同了萨特的观点，只有不断更新的关系，才是真实的。但她从小所受的正统教育以及她在现实中所遇到的一切又往往不自觉地与上述观点产生冲突，因而她也常常倍受痛苦的煎熬。

利穆赞之行后，西蒙娜·德·波伏瓦返回巴黎。为了避免父母过于干涉自己行动的自由，阻止她与萨特的交往，于是她搬到了德费尔街外祖母布拉瑟夫人家里居住。她向外祖母租了一间房，按时付其房租，从此她开始有了一个小天地，同时也开始了独立的生活。获得了哲学教师资格证书后，波伏瓦在维克多·迪律伊中学找到了一份代课教师的工作。她教的是一些未通过中学会考的捣蛋生。由于她初次站讲台，还不懂得摆出一幅严厉的面孔，所以学生们总认为她和善可欺，常常乘机搞恶作剧，让她难堪。面对

令她无比失望的这群笨学生，她常常难压怒火，摔门而去，因而在该中学只代了几个月的课就被校方解聘了。利穆赞之行后，萨特也回到了巴黎。他暂时住在圣雅克街200号的外祖父家里。西蒙娜和萨特经常通信、会面。一天晚上，他们在卡鲁塞尔公园里漫步时，萨特建议西蒙娜和他签署一份为期两年的协议。该协议的内容有两点：一是两年中两人各自保持独立，不同居。二是他们之间永远要坦诚，永远不相互欺骗，尤其是不向对方隐瞒什么事。缔结爱情协议后，这一对恋人在两年之中，果真完全保持了独立，每个人都保持着个人行动的自由。

萨特在与西蒙娜缔结爱情协议后，对西蒙娜十分坦诚，从不隐瞒自己的一切。这期间萨特向波伏瓦坦白了自己与第一个恋人西蒙娜·约利韦的关系，以及他们新近的交往。西蒙娜·约利韦是萨特青年时代热恋的第一个女人。她比萨特年长四岁。她生活不循习俗，行为诡秘，是个爱附庸风雅的女子，而且常追求时尚，喜欢标新立异。萨特是在年仅19岁时，在去图鲁兹参加一个表兄的葬礼时结识了西蒙娜·约利韦的，并对她一见钟情。后来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读书的萨特曾邀她来巴黎度假，并常带她参加他的社交活动。一次在与萨特一起出席高师学生的一个聚会时，西蒙娜·约利韦那标新立异的服装曾让萨特的伙伴们

不胜惊讶。此后在与萨特的交往中，她又不断移情别恋，后来又爱上了巴黎先锋派导演夏尔·迪兰，并成为了他的热情的情人。尽管如此，萨特后来仍无法割舍对西蒙娜·约利韦的感情。萨特在与西蒙娜·德·波伏瓦相爱后，仍不时去看望约利韦。他在波伏瓦的面前也从不掩饰他对约利韦的好感。他欣赏约利韦的勇敢、聪颖，赞叹她在服装上的高品位和对艺术的鉴赏力。面对萨特的直言不讳，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内心常萌发醋意。她虽然承认那份爱情协议的存在，但与萨特不同的是，西蒙娜·德·波伏瓦尚处在热恋中。她把萨特视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的人，因此，她把她所有的爱恋都倾注在萨特身上。而眼下，她的幸福却受到了威胁，另一个西蒙娜以其魔力迷惑了萨特，她要接替波伏瓦在萨特心目中的地位。西蒙娜·德·波伏瓦在与萨特签署了爱情契约后，首先遇上了感情上的麻烦。为了摆脱烦恼，她决定亲自上门拜访西蒙娜·约利韦。已成为先锋派剧院名演员的约利韦在自己豪华的寓所里身着盛装热情而又大方地接待了西蒙娜，然而在客人面前，她却表现出了高高在上不屑一顾的优越感。会见了约利韦以后，西蒙娜·德·波伏瓦反而感受到一种隐约的失败感和挫折感，她不得不承认，西蒙娜·约利韦是一位自由的、有创造力的女子的楷模。从约利韦身上，她看到了女性充满自信

的魅力。正是受西蒙娜·约利韦的刺激和影响，西蒙娜·德·波伏瓦决定要重塑自己，要寻找个人的自由，要探索自己的生活方式，要焕发自己的魅力。

从1929年底至1931年初，让-保尔·萨特在图尔气象台服兵役。西蒙娜·德·波伏瓦则仍留在巴黎。受西蒙娜·约利韦的影响，她开始重塑自我。她改变其以往循规蹈矩的形象，开始尝试过一种潇洒、自由自在的生活。她学会了抽烟，经常出入于蒙巴那斯区的艺术之家咖啡馆。她与一些先锋派作家、艺术家频频交往，参加他们的集会。她还经常独自出入电影院、剧院、音乐厅。此外，为了丰富自己的学识，她也继续埋头读书。这一时期的西蒙娜·德·波伏瓦显然已步入了19世纪的乔治·桑和20世纪的科莱特的后尘，一心要成为自由开放的独立的新女性。正是受爱情力量的激发，西蒙娜·德·波伏瓦开始探索女性存在的意义以及她们确立自由独立生活方式的重要性。西蒙娜·约利韦给予了她一个启示，而她却不赞成约利韦那种靠男人在艺术界站稳脚跟的捷径。她认为女性只有确定自我，才能真正获得自由和独立。

1931年，萨特结束了一年半的兵役生活，回到了巴黎。当时，他正准备去日本谋取一个助教的职位，但很快就失望了。于是他被指派到北部城市的勒阿弗尔中学执教。而此时，波伏瓦也被指定去南方城

市马赛任教。两位有情人将从此天各一方。临行前，萨特见波伏瓦的情绪沮丧，便建议两人结婚，但同时他又指出，为某种原则作出牺牲是不明智之举。西蒙娜·德·波伏瓦拒绝了萨特的建议，她以为保持他们目前这样一种自由、平等、独立的个人关系是最合理的、最新颖的。她不愿意落入俗套，让婚姻束缚双方行为的自由。他们甚至决定修改卡鲁塞尔爱情协议，取消临时契约，但他们仍发誓相互之间要坦诚。

1931年9月是西蒙娜与萨特相识相爱两周年的日子。但在这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里，西蒙娜和萨特相互握别，各自踏上了征途。萨特将动身北上去勒阿弗尔，而西蒙娜则南下去马赛。他们临行前没有信誓旦旦，只有各自道一声珍重和平安。

第五章 哲学教师

1931年9月，23岁的西蒙娜·德·波伏瓦乘火车南下，来到濒临地中海的法国第二大城市马赛。马赛这座法国南部的著名城市，以其夏日的阳光、美丽的海滩令人神往。由于在历史上，她是连结东西方国家的纽带，因此具有悠久古老的文化传统。波伏瓦对自己能来到这座古老的城市、南部的经济中心和法国的最大港口工作感到十分满意。在这里她成为了受政府委派的、蒙格朗公立中学的一名哲学教师。

在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教师的工作不乏魅力。当时，能踏入教育界，获得稳定有保障的教师职位，对大部分人，尤其是年轻的女性，实属是一件荣幸的事。而在公立中学，哲学教师更是体现国民教育的光荣和神圣的职业。第三共和国尤其重视公立中学的哲学教育，把哲学教育看成是培育公民道德思想品质的重要途径。而当时能获得哲学教师资格证书的更是少数。所以西蒙娜·德·波伏瓦来到蒙格朗公立中学执教，成为了校方极为关注的人物。

然而，西蒙娜·德·波伏瓦在蒙格朗中学执教不久，她的表现就令校方感到不满和失望。因为西蒙娜

在课堂上经常对社会政治、传统道德、法律制度、社会就业、福利保障以及国家的殖民主义政策等诸多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在涉及有关道德的问题上，西蒙娜常常否定正统的道德观念、谴责世俗偏见。她经常跟学生谈及纪德、普鲁斯特，把这两位作家蔑视资本主义社会文明传统、追求个性自由的思想介绍给学生，引导学生独立去思考一些社会问题。她有时还不严格按照教学大纲内容的要求授课，只谈她认为是重要的内容。她还不满意传统的教学方法，主张采用启发式、开放式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在课外时间大量阅读书籍，反对学生死记硬背教师的笔记。但她在蒙格朗中学所作的教学尝试受到了校方和学生家长的反对，人们接受不了西蒙娜·德·波伏瓦的新思想，校方甚至向她提出了严重警告。但波伏瓦面对校方的强硬态度，也不甘示弱，她决不退让。校方见她固执己见，也只好对此事不了了之了。

在蒙格朗中学，人们对西蒙娜·德·波伏瓦的指责还不仅于此。人们不仅对她在课堂上否定传统道德，宣扬自由主义思想的做法表示了不满，而且也极看不惯这位喜欢标新立异的女教师那无拘无束、不顾平时生活细节方面的言行。西蒙娜平时在蒙格朗中学喜欢独来独往，且从不结交他人。她总是独自一人去看电影、去咖啡馆、去食堂。在周围人看来，她总是显得

有些特别，总是处处与众不同。每逢节假日，她总是单独消遣。她常常在星期四或星期天穿上旧裙子，背上布提包，徒步出门旅行。这种旅行使她一次比一次走得更远。她计划走遍当地的每一个角落。她常常独自一人翻山越岭、爬山涉水，在野外宿营。有时她还拦过路的汽车，搭乘司机们的便车旅行。在旅行中，她也常常遇到不测的险境，但她对此并不畏惧。

对于西蒙娜·德·波伏瓦的远足，周围的人们议论纷纷。许多善意的人提醒她需小心，以免发生意外。而恶意的人则借此散布她的谣言，乘机对她的行为加以渲染，到处说三道四。

随着时间的流逝，西蒙娜·德·波伏瓦在蒙格朗中学执教已逾一年。一年来，她从不顾及他人对她的看法，而只求自由自在，用我行我素的方式去面对一切。然而时间一长，人们对她的行为举止居然也见怪不怪了。而波伏瓦的发式、装束、爱打网球的嗜好，以及幽居独处、清高洒脱也渐渐都成了人们热衷谈论的话题。慢慢地，人们开始以一种新奇的目光注视她，欣赏她。蒙格朗中学的学生们也开始学着模仿她的一举一动。

西蒙娜·德·波伏瓦在蒙格朗中学执教的一年期间，她时常在假期去和萨特会面。而且他们也一直书信频频，仍保持着精神上的默契融洽。萨特在此期间，

正在写一篇“偶然性”的论文，这篇论文是他后来的著名小说《恶心》的初稿。而西蒙娜在这一时期也开始尝试写小说。她从事写作主要是为了在幽居独处中同自己对话，另外也把自己对生活的体验通过文字表达出来。

1932年9月，西蒙娜·德·波伏瓦离开了马赛的蒙格朗中学。她欣然北上，前往法国东北部的卢昂城去接受一个新近谋到的教师职位。卢昂城与萨特所在的勒阿弗尔市毗邻。从勒阿弗尔到卢昂乘火车只需一个小时。这样，西蒙娜和萨特就可以经常相聚。而且从卢昂至巴黎的交通也很便利。西蒙娜对自己这次的选择十分满意。

西蒙娜·德·波伏瓦这次执教的学校是卢昂的贞德中学。这是法国的一所名牌学校。从1932年至1936年，波伏瓦一直在这所中学教书。初来学校后，西蒙娜一改其在马赛蒙格朗中学时的那种我行我素的生活方式，这次她不再独往独来，不再把自己封闭在狭窄的单人居室里。来到贞德学校，她对女教师科莱特·奥德丽组织的一个先锋派小团体挺感兴趣，于是就努力接近这个团体，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在此期间，她还与巴黎的先锋派导演夏尔·迪兰建立了联系。此外她还接触了一些在卢昂从事革命活动的马克思主义者。

随着这种开放式生活的继续，西蒙娜·德·波伏瓦的交往范围也越来越大，她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一个活跃人物。其中应特别提到的是，一些在法国避难的德国共产党员也经常参加他们的聚会，与他们探讨改造社会的政治问题。与这些激进分子的交往，使西蒙娜·德·波伏瓦上了中学校方的黑名单。校方对西蒙娜参加政治活动表示了极端的恼怒。此外校方还指责波伏瓦在讲课时宣传自己的主张，即女性要争取自由、平等的权利，拒绝社会强加给女性的义务。正是她的一系列主张，激起了校方的极大愤慨，使得校方命令西蒙娜和其他教师，必须对学生进行鼓励生育的宣传。然而西蒙娜对校方的指责不仅给予极端蔑视的态度，而且还公然违抗其郑重的命令。她首先对校方的旨意尽情地嘲讽了一番，继而进一步向学生宣称，女人并非是生儿育女的工具。她甚至建议女学生步自己的后尘，解放自己，寻找情人。因此，从表面上看，来到卢昂后，波伏瓦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态度，但在本质上，在她的精神世界里，蒙格朗中学讲台上的主张却始终动摇不了。结果，可想而知，在贞德中学，波伏瓦因思想激进再一次遭到了守旧派人士的攻击和诋毁。个别教师指责她根本不称职。

这期间，西蒙娜·德·波伏瓦对工作、对社会活动投入了全部的热情。她不再像在蒙格朗中学时那样，

在周末和假日里单独外出，去徒步旅行，而是经常泡在保尔饭店的餐厅里写作。西蒙娜喜欢那里的清静，并曾在那儿完成了一部小说。她此时对现实生活的兴趣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即便在和萨特通信时，或与他聚会时，也常常喜欢探讨一些社会问题，表现出了对外界、对社会诸多方面问题的高度关注。西蒙娜时常和萨特一起探讨如何深入到人和社会生活的内部去分析和探索问题。他们常常搞些社会调研工作，经常专心阅读刊登社会杂闻的刊物，而且研究产生诸多方面社会问题的社会机制。波伏瓦甚至提出了改造现存社会制度的种种方案和设想。她对当权阶级表示不满，认为只有打倒他们才能改变社会。这一期间，她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密切交往也充分反映了她对政治和社会活动，对改造社会问题表现出了较大的兴趣和热情。

在卢昂中学执教期间，西蒙娜·德·波伏瓦发现自己所置身的这个社会处处对自己充满敌意。基于对社会的不满，她开始探讨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她认为这个社会充满了偏见和不公正，需要进行改造。但正如萨特向她指出的那样，她不属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不是她所属的阶级的斗争方式。而知识分子唯有保持自由，才能免于被社会异化。在与萨特的反复探讨中，她不断地回想着这一思想，始终思考着究竟应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与社会对抗，并且渐渐地对知识分

子这一特定的形象有了加深的理解。是的，最可贵的是自由，保持自己精神的自由和独立，只有这种精神的自由和独立，才能使他们超越一定的社会准则之上而不受其支配。而这不正是西蒙娜·德·波伏瓦她本人所坚持的一贯作风吗？

然而，也正是因为这种超凡脱俗、我行我素，使她拒绝按照社会的意志，公众的舆论改变自己。而一旦她把这种个性带进了生活中，不仅引起了卢昂贞德中学同事们对她的非议和疏远，而且也引起了萨特对她的忧虑。一次，西蒙娜·德·波伏瓦穿着一双露出一个大洞的长袜与萨特去一家豪华饭店吃饭。萨特见她衣着随便、马虎，拒绝陪她前往。西蒙娜向萨特申辩道：别人的看法对他们没有丝毫的影响。然而萨特则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西蒙娜的所作所为已经使他受到了指责。但西蒙娜·德·波伏瓦仍然在生活中，骄傲地我行我素。

波伏瓦在卢昂贞德中学教书期间，萨特离开了勒阿弗尔去德国留学。波伏瓦自从与萨特相识以后，和萨特离多聚少。其间她既要忍受分离的痛苦，又要忍受萨特移情别恋插曲的烦恼。1934年萨特在柏林留学时又爱上了一个同事的妻子。波伏瓦闻知此事后，于1934年2月动身去柏林探望萨特。她的到来及时阻止了这场事件的发展。在柏林期间，波伏瓦和萨

特对柏林进行了深入的了解，但此时，德国的纳粹主义势力日益猖獗，萨特和波伏瓦不得不中止在德国的逗留，提前返回了法国。

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萨特从德国归来后，继续在各自的中学执教。萨特归国后已不愿为中学教师的职位所束缚，他渴望自由，希望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哲学研究中。他正着手写哲学论文。而波伏瓦在这一期间，既要忙于教学、忙于写作，还要忙于辅导她的一位女学生奥尔加·高萨绮薇茨。

奥尔加是俄罗斯贵族的后裔，大革命时举家流亡法国，后落破于卢昂，故她不得不寄宿于贞德中学。这个美丽的金发少女多愁善感而又倔强易怒，不由引起波伏瓦对自己少女时代的共鸣。在发现她有学习哲学的素质后，波伏瓦决定培养她，后经其父母的同意，进而成为奥尔加的监护人。萨特在这期间常从勒阿弗尔来卢昂探望波伏瓦，因此也开始结识了奥尔加，他甚至与波伏瓦一起为奥尔加制订了学业计划，并一起承担了对奥尔加的学习辅导。然而此景不长，随着对奥尔加学业辅导的失败，萨特却对这个热情的少女产生了爱恋。在他不惜一切的迷狂般的进攻下，奥尔加与萨特走到了一起。于是西蒙娜、萨特、奥尔加，这一对监护人及其被监护人开始出演了一曲一家三人的三重奏生活，但这种生活到了1936年却无论如何

维持不下去了。恰巧这时波伏瓦奉令调离开卢昂，前往巴黎的莫里哀中学任教。而萨特因不愿被派往里昂的中学，便在拉昂的一所中学找到了教师的职位。就这样，西蒙娜只身又回到了巴黎。

在巴黎的莫里哀中学，西蒙娜·德·波伏瓦继续任哲学教师，这是她任职中学教师的第五个年头了。这期间，她曾在法国两所名牌学校任过教。但在莫里哀中学，她仍难逃脱被学生们终日议论的命运。莫里哀中学是巴黎一所具有传统风格的学校，这里的学生已习惯了教师们审慎、稳重的传统形象，因而对这位28岁的，留着冠冕型新发式，而风度优雅的女教师感到惊奇。尤其当学生们听说，这位年轻的女教师与某个男教师同居而不结婚，只忙于写作而拒绝干家务、下厨房的消息时，他们就对她另眼看待了。但西蒙娜·德·波伏瓦在任何新的环境中是从不会在乎公众舆论的。她仍和在马赛、卢昂一样，毫不理睬这些流言蜚语。她在上课时，仍然一贯采用启发式、开放式的方法进行教学，她的教学内容常常超出教材的范围，课堂上，她喜欢旁征博引，喜欢给学生开出一些长长的必读书目。她的课尽管很高深，但却极大地开启了学生的智慧，她使学生了解了许多当代文学、当代哲学的思潮。

来到巴黎莫里哀中学执教后，西蒙娜·德·波伏

瓦又回到了从前她所习惯的生活圈子里。她在盖得街的罗阿尔·布列塔民族馆租了个房间，过着独立的生活。她经常去蒙巴那斯剧院，观看先锋派戏剧。由于早年受父亲乔治的影响，多年来，她亦像当年的父亲一样，对戏剧非常热爱和着迷。这么多年过去了，如今西蒙娜的妹妹海莱娜已经成为了先锋派画家。在妹妹的陪同下，她有机会经常出入先锋派画室。回到家乡后，西蒙娜终于找回了往日在蒙巴那斯做姑娘时的生活习惯。在巴黎，人们不像在外省那样，用一种异样的目光去看待她，在这里，波伏瓦又找到了她理想中的“自由”。

然而，这种自由的生活刚刚开始不久，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平静生活却又被搅乱了。奥尔加不顾父母的阻拦，乘火车来到巴黎与波伏瓦相聚。她渴望过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更渴望独立，为了自谋生路，她先在蒙巴那斯区卖茶水的舞厅里当招待员。波伏瓦试图劝说她谋求一个职业，但被她拒绝。此后波伏瓦再次鼓励她去听先锋派导演夏尔·迪尔的课。终于在波伏瓦的帮助下，奥尔加最后进入了夏尔·迪尔的剧院，成为了一名演员。

这一期间，由于社会生活的丰富，波伏瓦也十分忙碌。首先她每周要完成莫里哀中学16课时的教学任务，要定期出席先锋派导演夏尔·迪兰及其情人西

蒙娜·约利韦的活动，观看他们剧院的排练。她要应酬与艺术家、名流朋友们的交往，要照顾奥尔加的生活。此外她还不愿放弃享受巴黎这个文化之都现代生活的机会，因此要用许多晚上光顾咖啡馆、剧院、电影院。但是，更重要的是，她还要挤出相当的时间，用于发奋写作上。1938年萨特因发表了《恶心》和《墙》两部作品而在法国名声大振。与此同时，西蒙娜也根据她与萨特、奥尔加三人的特殊经历，也着手写一部自传体小说《女客》。

1939年3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6月23日，法国与英国、土耳其签订了一项互助条约。9月法国宣布参战，部长会议颁布了总动员令。萨特必须参军，上前线。西蒙娜在送别了萨特之后，继续留在了巴黎。在战争空气最紧张的阶段，她仍常去蒙巴那斯车站旁的三剑客咖啡馆里写作。当战争的阴云笼罩着巴黎时，每个人心中都抹不去死亡的阴影。西蒙娜也常常思忖着自己的处境，但她仍能平静地一如既往地正视着现实。”现在我将置身于战争这种存在中，尽管它对我来说是凶多吉少。”在紧张的战争期间，西蒙娜表现出了从来未有过的镇定和勇敢。她一方面努力地重新寻求自己正常的生活，一方面借此特殊的环境深入地进行一些人生的思考。白天她写小说、教课、看朋友、到餐馆去吃晚饭、上咖啡馆、进酒吧、

去电影院以及参加大家的各种活动。深夜回到那自己的一隅，则握笔沙沙，冷静地注视着和书写着这现实的一切。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西蒙娜·德·波伏瓦始终未离开塞纳河左岸的蒙巴那斯区，在那里工作着、忙碌着。她没有被战争所吓倒，没有受恐惧感所左右，而这本身就是对这场罪恶战争的最大蔑视。

战争期间，波伏瓦有时也设法弄到通行证，前往前线去看望萨特。他们继续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尽管战火连绵，他们仍设法频繁通信，甚至在信中继续讨论着他们共同的写作计划。1940年6月，法国军队自认为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被德军出忽意料地攻破了。萨特与马其诺防线的守军一起进了德军的战俘营。波伏瓦得知此讯后，万分焦急。但后从萨特的来信中，得知萨特也和自己一样，虽然被战争中所发生的意外事件所左右，但从未丧失对未来的信念。他在集中营中，仍在撰写着哲学论著《存在与虚无》和小说《自由之路》。西蒙娜受萨特顽强的生存意志的鼓励，更加忘我地工作。她每天早晚必坐在多姆咖啡馆里进行写作。1941年3月，萨特因视力欠佳和借口文职人员而获释返回巴黎，回巴黎后，继续在巴斯德中学任教。这次战争使萨特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在战争前，萨特是个个人主义者，他认为他自己并不与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之间有什么必然的关系。而二战

的经历使萨特突然明白了自己仍是一个社会的动物，因此必须干预生活。前线的经历，使萨特对当时巴黎城中弥漫的妥协气氛极度不满，于是他开始与巴黎的抵抗运动组织取得联系。西蒙娜在萨特的影响下，也参加了抵抗运动组织。她积极协助萨特与“社会主义与自由”组织取得联系。萨特在这一时期还开始向法国左翼组织——法国共产党靠近，试图与他们建立一个联合阵线。但左翼组织却一直怀疑萨特的获释可能与德军有一定的联系而对萨特的行动持不信任的态度。因此，萨特不得不通过文学创作活动的形式宣传他的抵抗思想。而西蒙娜这时也坚信，作家应该通过自己的作品来行动。自此，她更加把写作视为她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

1941年至1944年，巴黎被德军占领，全国的政治气候也由此阴暗。沦陷使巴黎人消沉、沮丧。当时的法国市民、知识分子团体逐渐分成了两派。一派为左翼组织，包括“社会主义与自由组织”、“巴黎地下抵抗运动组织”以及“法国共产党”，他们都憎恨德国法西斯主义，坚决主张抵抗占领军。另一派被称为右翼组织，主要是第三共和国的一些政治家、亲德分子。他们主张要识时务，要与占领军合作。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萨特主要站在抵抗运动组织一边，主张与占领军对抗到底。而他们的朋友夏尔·迪兰和

西蒙娜·约利韦则主张在德国纳粹统治时期，应该与占领军合作。波伏瓦对自己的朋友竟然在纳粹铁蹄下表现出来的厚颜无耻和奴颜卑膝深感厌恶和反感。她和萨特一样，实在蔑视这种充斥巴黎的妥协气氛。然而在战争中，朋友之间因政见不同而反目为仇的事是屡见不鲜的。波伏瓦只是对这两位朋友这么轻易地就放弃了昔日高唱的自由主义主张，而卑躬到纳粹一边深感惊讶。由此，她以往在心目中，对西蒙娜·约利韦所建立起来的“自由形象”，一下失去了光环。

西蒙娜·德·波伏瓦在沦陷期间，仍在莫里哀中学执教。这一期间，奥尔加与波伏瓦、萨特的朋友博斯特结了婚，从而离开了波伏瓦。奥尔加走后，波伏瓦的又一个学生娜塔丽·索罗舍娜又引起了她的注意。这个少女具有和奥尔加相似的性格，但比奥尔加更加倔强、好斗、易激动，具有一种强烈的反叛性格。由于娜塔丽的特殊个性，再次使波伏瓦产生那种不可名状的想帮助她、培养她的强烈愿望，后经与萨特商量，终于使她成为了这个“家庭”的成员。波伏瓦像对待奥尔加一样关心、培养娜塔丽。她花时间引导她对哲学的兴趣，指导她阅读，教她写文章，并经常带她去咖啡馆、酒吧、电影院。但娜塔丽的母亲却不喜欢女儿的这种生活，她认为女儿受波伏瓦的影响，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1943年，她向校方指控波伏瓦

诱骗未成年少女。这一指控终于使从教 12 年的西蒙娜·德·波伏瓦被学校开除。波伏瓦的哲学教师生涯就这样结束了，她从此再也没有资格去教书了，从而也就失去了职业和固定的经济来源。

然而就在同一年，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第一部小说《女客》出版了。该书很快就成为了畅销书。法国的地下报纸和合作报纸都给予这部小说以很高的评价。波伏瓦顿时名声大震，被誉为新近法国文坛上的“新的小说家”、“法国文学的希望”。《女客》一书的出版是西蒙娜·德·波伏瓦一生的转折点。从 1931 年至 1943 年，波伏瓦一边教书，一边写作。然而在教书生涯中，12 年来她一直受到指责，蒙受许多不白之冤，她被指控为“不称职的教员”、“诱骗未成年少女的教唆犯”。但在作家生活道路上，从一开始，她就被视为是一位天生的作家、幸运的小说家。而 1943 年的被开除事件却促使她走上了最初的专业作家的创作道路。从此西蒙娜·德·波伏瓦将以法国文坛上一个才女，一个女政论家，一个女权主义运动家的形象出现在读者和公众的面前。

第六章 爱情契约

西蒙娜·德·波伏瓦自从1929年结识萨特后，便把维护和保持与萨特的亲密关系当作她生活中的一个轴心。但她当时却远没有预料到，她与萨特之间的爱情关系到后来是何等的复杂。这其中既有个人的秉性、特定的时代、历史的契机等问题，也有两人的观念、学识、修养、追求的影响。但最关键的却是，自古以来对待个人的感情、爱情的问题，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和做法。而爱情的关系在不同的国度以及不同的个人身上也都会呈现出不同的复杂形态。就西蒙娜与萨特的爱情来说，则也完全可以理解为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特例。

萨特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传统型或现代型的男人。他很难被归类为究竟属于哪一类型的人。在他身上常常表现出一种双重性格的统一。在他身上，既有常人所不具备的傲然盖世的精神和求索不息的品质，也有常人皆具的陋习怪癖和盲从冲动。在与朋友交往中，他深重友情、诚信待人；在与情人交往中，他能坦荡、真诚和宽容；在看待金钱上，他视之为身外之物，从不锱铢必较，而总是慷慨无度；而作为一个哲学家，

他能在所置身的任何恶劣环境中做到超然度外。他总是能够从复杂的现象中关注到最本质的问题。他的最高境界是永远保持思想的独立性而不断思考存在的意义。然而在萨特的身上也有许多飘忽不定、变幻无常的东西。他本性不恪守常规，易受新奇事物的吸引，时常会背叛他人甚至背叛自己，冥冥行动中，又招来身后多少怨骂。

西蒙娜·德·波伏瓦就是因被萨特的这种双重性格所吸引，才被他身上所特有的那种精神品质的魅力所征服的。从结识萨特到两人相爱初期，西蒙娜凭着她那女性的特有眼光和哲学思辨性的洞察力在熟悉萨特，了解着萨特。她早就意识到在他们的恋情中，自己将把握不了萨特的感情。而随着他们爱情关系的发展，她也感受到了自己在这种关系中，总处于一个被动者的地位。而这种地位就往往决定了她和萨特爱情关系的实际。

萨特自与波伏瓦建立了亲密的伙伴关系后，就从来没有要履行一夫一妻制的意愿。在萨特看来，一夫一妻制是教会倡导的一种传统的婚姻关系准则，它代表着一种静止的保守的观念。这种婚姻关系并不能体现男人与女人之间丰富多采关系的全部本质内容。而完美的男女关系应该是自由、平等、相互给予的自然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男女各方也都应像在思想和精

神追求上那样，保持各自的独立。即使双方在这种关系上建立了一些约定，这种约定也不该是向对方承诺什么的一种保证书，而只能是双方在维系这种关系时，共同达成的一些规范。因此，任何束缚和限制男女个人自由的婚约都是无理的。基于这种观点，萨特主张打破传统的一夫一妻制和狭义上的占有与被占有的男女关系，倡导建立一种新型的契约式的爱情。后来这种契约式爱情的核心意义被明确为，男女双方可以在双方协议允许的范围内，各自保持个人行动的自由和与他人保持密切交往关系的权力。在萨特的建议下，西蒙娜于1929年就同意与萨特签订了爱情契约。他们于1929年深秋，在巴黎卡鲁塞尔公园里，签订了第一个口头协议：卡鲁塞尔协议。从这一天开始，西蒙娜·德·波伏瓦就与萨特开创了一个爱情关系的新模式、新典范。他们携手共度50年，只同居而不结婚，只保持亲密的关系，但各自仍按照自己的生活轨迹行动。他们终生保持着相伴，但人生的绝大部分时间却各居寓所，完全过着一种单身的生活。

然而，回首1929年，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同意萨特的建议后，并没有感到这一爱情契约会给她以后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她也没有想到这种方式的爱情，在一生的把握中竟也是相当的复杂和不易。当时，她仅仅考虑的是，他们之间是一种有创建性的，

可以不断更新的，因此也是最具有生命力的、真正的爱情关系。这样对婚姻的拒绝也同样可以使她从不自由的社会约束中超脱出来，也同样可以使她像男人那样独立地享受自由的生活。然而，一旦到了具体的生活中，这条抽象的原则就会演化出各种各样具体的感情纠葛。

从1929年至1934年，波伏瓦和萨特基本上保持着正常的情侣关系。他们依契约上规定的那样各自享受着独立和自由。无论是在马赛与勒阿弗尔间，还是在勒阿弗尔与卢昂间，两个人都能在精神上保持高度的一致。这期间，心灵的激荡、感情的融洽，都使双方享受到这种新式契约爱情的轻松的幸福。正如萨特后来回忆道：“我们中每个人都支持另一个人，于是由此产生了力量巨大的‘一对’，……当然同海狸的联盟达到了更高度的完美时，联盟的结果便是使人感到沉重的幸福。”在此期间，尽管萨特仍艳遇不断，韵事频出，但均如浮云流水，一倏即逝。因而也并未影响到两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但当17岁的俄罗斯少女奥尔加介入进他们的生活后，爱情的契约却在三人中搅起了一场不小的漩涡。

奥尔加本来是在1935年，在卢昂贞德中学，以波伏瓦的学生和被监护人的身份加入到这个家庭中来的。萨特在与波伏瓦共同辅导她时，疯狂地爱上她。

这个美丽的金发少女以其倔强、好胜、幻想、热情、高贵、大度的独特气质深深地吸引了萨特，以致萨特一见到她就感到一切都是万般的美好，情绪也变得轻松开朗，视奥尔加为使他活力焕发的万灵药。这种情感当时曾被写入日记中：“两年间，正是我对奥尔加疯狂爱恋之时，也是我最懦弱的时候。”这一插曲的出现，使波伏瓦始料不及。在她心底的感情中，既有对萨特的真情爱恋，又有对奥尔加的眷眷依恋。面对萨特与这个学生之间的情感存在，她又不忍生生强拆，而且理智也告诉她，依爱情的契约，她似乎无权干涉此事，而从情理上讲，她又何必非要去干涉萨特的独立和自由？对此事，西蒙娜曾揣来掂去，前思后想，很难找出明智的处理方法。直至1936年，在三人慎重的商议下，奥尔加、波伏瓦和萨特终于组建了一种“三重奏”式的生活之家。对“三重奏”关系的首肯，是波伏瓦在诸般感情难以排遣下，出于理智考虑的结果。这种情感曾被西蒙娜本人在其《年富力强》一书中谈及：“我们将成为‘三人行’、‘三重奏’。我们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需要不断地加以创造发展，没有一种人际关系是不可能的、无权存在的，而我们的三人形式就这样产生出来，成为了现实。”

1936年起，西蒙娜·德·波伏瓦和奥尔加及萨特建立了“三重奏”生活。这种生活实际上是西蒙

娜和萨特继相识 7 年后签订的又一爱情契约。“三重奏”的发起者和倡导者是萨特，而西蒙娜只不过是被动参加者。尽管西蒙娜在最初认为，“三重奏”的生活可以使她与萨特，她与奥尔加及萨特与奥尔加之间的感情都能得到维持，但不久就使这种感情陷入了复杂的纠葛之中。因为她在这种生活中从未感到过自在。关于这一时期的感情体验，她在后来的《年富力强》一书中谈到：“我试图在这种关系中得到满足，但我白费了力气，我在其中从未感到自在。我依恋萨特，我也依恋奥尔加，但这两种方式不同，不能同日而语，而且都是排他性的、专一的。我对他们的不同感情不能混为一体。”此外，她对萨特和奥尔加还产生了嫉恨。关于这种嫉妒心，她也曾在《年富力强》中回忆道：“当我们三人一道外出时……奥尔加投萨特之所好，表现得比和我在一起时更妩媚、更娇态十足、更搔首弄姿……而萨特在一心关注着奥尔加的时候，与和我单独相处的时候则判若两人。因此，在这种三人聚首中，我总感到受了双重的损害。”而在这种“三重奏”的生活中，不仅仅是西蒙娜一人觉得受到伤害、嫉妒、猜疑的折磨，萨特和奥尔加也从未感到自在过。这正如后来，萨特在其存在主义境遇剧《间隔》中所精辟地概括的那样：“他人，就是地狱。”1937年，这种“三重奏”生活在勉强维持了几个月后，终

于被宣布解体。几个月来，在这种“三人行”关系中，每个人的心灵上都伤痕累累，彼此都为此而付出了代价。

自从与萨特和奥尔加创建“三重奏”家庭后，西蒙娜·德·波伏瓦并未觉惬意，一种难言之痛苦在心中的翻腾搅扰，曾使她扪心反思。为了排遣这种痛苦和烦闷，也为了排除杂念仔细探寻一下这种“三人行”关系的合理性，1937年初，她暂时撇下萨特和奥尔加，邀请了萨特昔日的同窗，后来他们亲密的良友雅克洛朗·博斯特与她一道共赴普罗旺斯和阿尔卑斯山旅行。博斯特是个热情开朗、生活随意的人，他也是位追求精神高度独立和自由观点的鼓吹者，而且他还奉行独身主义，只承认现实的爱情。多年来，他和波伏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此番与博斯特结伴而行，西蒙娜感到无比轻松和愉快。他们徒步远行于山野之间，黎明而起，日暮而歇。农家的粮仓，乡间的小咖啡馆，都曾作过他们歇脚的客栈。白天，他们寄身于山水田园间，并肩漫步，随意畅谈。夜幕降临后，亦享受爱情的欢娱。从此难忘之行中，波伏瓦体验到了一种友谊、爱情、相互欣赏、相互信任、轻松、愉快的情感交流。

归来后，波伏瓦将愉快的阿尔卑斯山之行原原本本地讲给了萨特，萨特听后，略带醋意地坦然说道：

“你和博斯特很幸福。这样处理很不错。”此后，波伏瓦、博斯特、萨特又以“三人行”关系前往希腊旅行。而萨特在这种“三重奏”关系中，表现得却要比波伏瓦冷静和坦荡得多。他只是表现出有些不满，但并未因此而感到受了伤害。这种情感后来被萨特在其《文字生涯》一书中提到：“我预先接受意外的事故，接受不幸的遭遇。……我以笑脸相迎。”他在《七十岁自画像》中还说过，“没有任何东西曾使我感到失望。”然而，这个“三重奏”的关系终以博斯特与奥尔加的结婚而告结束。萨特和波伏瓦则充任了奥尔加的证婚人。

继这两次相叠的“三重奏”后不久，萨特又开演了另一出“三重奏”。1938年，他与奥尔加的妹妹万达情投意合。在这次“三重奏”中，萨特和万达都深坠爱河。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萨特在应征入伍之前，曾下决心要娶万达。在将行此举之前，萨特依与波伏瓦所签订的爱情契约，将与万达的关系都原本地告诉了西蒙娜。但终因战争和其他原因，这次三重奏又告失败了。

从1936年至1939年，萨特与波伏瓦之间的“三重奏”频繁出现，这使他们之间的爱情关系也变得异常复杂和微妙。波伏瓦从这一时候起，开始不断地思考“三重奏”发生的起因，以及她与萨特爱情

契约的本质。由此，她开始结合自己的爱情经历，对现代女性在社会及家庭婚姻关系中本身的处境问题作深入思考与探讨。这些思考奠定了她后来撰写有关妇女问题的著名论著《第二性》的基础。

“三重奏”是西蒙娜·德·波伏瓦始料不及的意外插曲，但却成为了她与萨特爱情契约中的重要内容。这种“三重奏”由于违背了爱情具有排他性这一自然法则和社会准则，因而既难以维持长久，又易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舆论的攻击。但它的出现却预示着一种新式婚恋观的诞生。“三重奏”以藐视一切传统的约定俗成的习惯为前提，是一种追求个人精神自由和独立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让·保尔·萨特为反抗他们所置身的社会所采取的另一种形式。而其哲学意义，正如萨特在其《七十岁自画像》一书中所说：“在第二次大战前，我把自己仅仅看作是一个个体，我完全看不到我个人的存在与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之间有什么联系。……我建立了整套理论：我是‘孤独的人’，就是说，是一个因其思想的独立性而与社会相对抗的人，这个人欠社会任何情分，社会对他也不起任何作用，因为他是自由的。”当然，西蒙娜并不是“三重奏”的发起者和倡导者，她只不过是在不自觉中被卷入其中。她并没有像萨特那样对这种“三重奏”的意义认识得如此清

楚。

“三重奏”对波伏瓦来说，最后已谈不上痛苦，只是复杂罢了。但它发生与否，对波伏瓦却完全不一样。“三重奏”的发生，在西蒙娜看来，是一次情感教育的良好机会。经历了它，每个人都受到了一次情感上的洗礼。对她本人来说，这种情感教育的最大结果是促使她获得了精神上的独立。在“三重奏”出现以前，波伏瓦在行动上可以说是独立的。她可以独自远足、独立工作、独自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然而在思想上、情感上，她对萨特却有强烈的依赖性，她重视自己在萨特心目中的位置，关注萨特的想法，希望萨特来影响她的行动。但“三重奏”生活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触动了波伏瓦的思想，使她不自觉地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这就是西蒙娜与传统女性的不同之处，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抱守残缺，以哀怨来代替反抗。

西蒙娜·德·波伏瓦基本上于1937年开始了写作，这也是她与萨特爱情关系中“三重奏”频频发生的时期。在她的写作生涯中，萨特曾建议她把自己的经历写入作品。于是在1938年，在萨特的启发下，西蒙娜开始以她与萨特及奥尔加的“三重奏”为背景，构思一部自传性小说。这部小说于同年10月动笔，历经近3年，于1941年终于完成，西蒙娜

命名之为《女客》。小说描写了一对年轻的情人弗朗索瓦兹和皮埃尔，他们出于同情收养了一个名叫格扎维埃尔的17岁的少女，并负责她的学业，充当她的监护人。这位姑娘就是书中所指的“女客”。这位女客拒绝接受弗朗索瓦兹和皮埃尔为她安排的前途，拒绝从事任何有意义的学习和工作，而只愿意按照自己的想法随心所欲地生活。出于对少女的同情和怜悯，皮埃尔对格扎维埃尔关怀备至。然而不久却身不由己地狂热地迷恋上她。于是弗朗索瓦兹和皮埃尔遂尝试了一种打破常规的生活，创造了“三人行”……

很明显，小说的素材基本取材于波伏瓦、萨特、奥尔加“三重奏”的真实生活。书中的女主人公弗朗索瓦兹就是波伏瓦，男主人公皮埃尔就是萨特，而格扎维埃尔则是奥尔加。在作品中，波伏瓦将几个月的“三重奏”生活中困扰自己心灵的万般情感体验凝聚于笔尖，将小说中独特的组合关系下，充满矛盾的人物之间各自的心理过程和情感冲突表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对小说中“三人行”的人际关系从亲密的朋友，发展到产生妒意，继而到怨恨的发生这一过程，西蒙娜用细腻的心理分析方法作了透彻的分析，她还深刻剖析了女主人公弗朗索瓦兹那爱恨交织、欲语不能的复杂心态。当然，作为小说，波伏瓦对作品的结局也作了虚构化处理。在《女客》的结尾，女主人公受难

抑的妒恨驱使，终于将房间里的煤气阀打开，以残忍手段，将情敌格扎维埃尔谋杀。这显然与现实生活中的“三重奏”的结局不相符合。但波伏瓦敢于在小说中，大胆地以自己为原型，将主人公塑造成一个谋杀者的形象，也无不反映出她那敢于蔑视社会道德的胆量。尤其是小说中，波伏瓦将弗朗索瓦兹在谋杀格扎维埃尔过程中的犯罪心理，挖掘得深刻、细致、真实、准确，无不衬透出她那种认真揣摩、记录人物的情感、行为，准确把握和逼真刻画人物性格心理的创作功底。

在《女客》这部作品中，波伏瓦几乎倾注了她的全部心血和感情。因此这部作品中也包含了她所经历过的、感受过的、体验过的一切心态和情感。从某种程度而言，它是一部以文学形式表现出来的，西蒙娜·德·波伏瓦人生重要历程的断代史。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波伏瓦，无论是在情感还是在行为方面，都超过了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形象。她的真实生活要远比小说中的形象，更具有启迪和教育意义。

1936年至1939年的“三重奏”插曲过后，紧接着二战爆发了，萨特被应征入伍。经历了情感教育和战争风暴之后，西蒙娜和萨特的爱情又有了新的升华和发展。回首战前的“三重奏”生活，虽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相继结束，但其中确实包含了一定的哲学性意义。从表面上看“三重奏”只表现出了男

女关系的复杂性，它更多地涉及男女关系中，异性相悦的自然属性一面。然而，导致“三重奏”失败终结的真正原因，也许并不是外部的因素，也不是生理学方面的因素。这要涉及西蒙娜·德·波伏瓦与让·保尔·萨特之间爱情关系的本质。西蒙娜和萨特所签订的爱情契约从本质上说，虽然不排斥对其他异性在男女相悦上的追求。但它更重在强调和维护双方在精神上的自由和融洽。从西蒙娜和萨特一相识起，两人就始终在追求目标、精神思想方面寻求一致，而努力达到情感上的高度融洽和默契。这种寻求精神上的共鸣关系是他们爱情关系之所以得以巩固和发展的基础。而从“三重奏”失败的事实来看，西蒙娜与萨特之间的精神合作关系也确实是其他关系所代替不了的。关于这点，萨特后来在其晚年的作品《七十岁自画像》中曾提到过：他常把他确定的或尚未确定的思想向西蒙娜表达。因为唯有她对于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认识达到了与他同等的水平。他把西蒙娜视为最理想的对话者，他与西蒙娜总是处在对等的关系中。

尽管在西蒙娜与萨特后来的生活中，“三重奏”仍然还会出现，但无论现实中他们各自与其他情人的关系如何发展，西蒙娜与萨特之间却始终保持着最初的爱情契约，终生相伴。他们在精神上是不可分离的。

他们一生中，相互欣赏、相互理解、彼此宽容。正如萨特所言，他们不是两个，而是一个“我们”。在20世纪的初叶，西蒙娜和萨特的契约式爱情，不仅给人们提供了两性关系的新模式，而且也引发了人们对于男女关系、爱情关系本质的新思考。

第七章 存在主义

1943年前后的战争期间，对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让·保尔·萨特来说，是一个迭宕起伏、荣辱俱存的时代。这期间，既值波伏瓦因莫里哀中学之控而弃教失业，及萨特于战中被俘而身陷囹圄的多事之秋，也是西蒙娜的《女客》出版和萨特一系列文章完成的丰获之年。更重要的是，这一年是他们发起著名的存在主义运动的标志点和里程碑。

萨特自因释回国后，积极地参加巴黎的地下抵抗运动。他四处呼吁，奋力笔耕，用文学的形式宣传他的政治主张，支持抵抗运动。该年初，他参加了全国作家委员会，并为法共领导的地下刊物《法兰西文学报》撰稿。同年4月，他的三幕剧《苍蝇》发表。该剧于6月2日在西岱剧院上演。彩排那天，在大厅里，萨特与年轻的阿尔贝·加缪初次结识。《苍蝇》的上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使萨特成了巴黎记者争相采访的热点人物。同年10月，萨特的哲学论著《存在与虚无》出版，该书的题辞是献给波伏瓦。此书的出版，又引起了巴黎文化界和读者的广泛关注。当时，评论界把萨特在这本论著中所阐明的哲学称之为存在主义。

萨特对此表示抗议，他反驳批评界：“我的哲学是关于存在的哲学。‘存在主义’我不知道这算什么学说。”不管萨特本人乐意不乐意，但他已被报界、评论界视为二战期间法国思想界最有影响的人物。萨特的声名鹊起，对西蒙娜·德·波伏瓦是极大的安慰。这一年，西蒙娜在经济上主要依赖于萨特。在萨特的鼓励下，她也开始结交巴黎名流，经常出席朋友、名人的聚会。在二战行将结束的最后一年，任《战斗报》编辑的阿尔贝·加缪常常请西蒙娜和萨特撰稿。为此，他俩在《战斗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报道巴黎解放的文章，这些文章极大地鼓舞了巴黎人的斗志。

二战结束前的最后一年及战后，西蒙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这一时期被她自己称为“道德时期”，实际上是其存在主义思想形成与发展的时期。1944年波伏瓦发表了一篇哲学随笔《庇吕斯与西奈阿斯》。在这篇哲学随笔中，波伏瓦阐述了“境况”的概念。她在文章中分析了人在现实中所处的种种境况，指出了人在境况中作出选择与行动的重要性。在《庇吕斯与西奈阿斯》中，波伏瓦对比了庇吕斯与西奈阿斯的人生态度。西奈阿斯否定选择行动的意义，他认为：假如人们为了要回自己的家，那又何必出行；需要停下来休息，又何必开始行动。而庇吕斯则肯定行动、选择的意义，他主张人活着就应该赋予其生命一种意

义，而通过行动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波伏瓦在文章中阐述了在同一类境况中，不同的选择会导致境况的变化。她对“境况”的阐述，对后来法国存在主义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受波伏瓦有关境况的概念的启发，后来萨特创立了一种新剧种——“境遇剧”。此剧专门把人物置于某一境遇中，促使人物作出某种行动或选择。萨特在其境遇剧中，提倡了自我选择的意义。

二战结束后，法国经济萧条，社会动荡，战争和德国法西斯的统治给法国人民造成了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而这一时期，法国报纸披露了德国集中营中屠杀犹太人的暴行，新闻媒介对集中营的报导不断引起了人们的震惊。加之美国在二战末，将第一颗原子弹投到了日本的广岛。新型杀人武器的使用使人们对战争的残酷性有了新的认识。一种厌战，逃避现实的情绪在法国蔓延。而战后的现实又使人们看不到希望。因此，这一时期，悲观主义、虚无主义思想抬头。人们重新又生活在一种新的恐惧、厌恶、绝望、消极的状态中。面对这一现实，萨特、波伏瓦和他们的朋友梅劳·庞蒂、雷蒙·阿隆等人共同创办了《现代》杂志。他们试图给世界提供一种新的思想体系，帮助人们消除一些消极的心理。1945年10月15日，萨特在《现代》杂志第一期上阐述了其介入文学的思

想和作家的革命作用。此后，萨特又发表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讲。而在同一个时期，西蒙娜·德·波伏瓦创作的剧本《白吃饭的嘴巴》上演了。这个剧本采用借古喻今的形式，揭示了战争中屠杀行为对人们心灵的重创，表现了战争的悲剧性和残酷性的主题。该剧本描写了战争中，许多妇女、儿童、老人、残废人，被视为“白吃饭的嘴巴”，他们被当局默许杀害。在战争期间，这种对无辜平民的屠杀不仅被默许，而且还被视为壮举。西蒙娜·德·波伏瓦试图在剧本中，探求这种野蛮、残忍行为背后的意义。该剧的上演与萨特的著名讲演《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终于引发了“存在主义”运动。尽管萨特和波伏瓦拒绝存在主义这个标签，但他们最终不得不再次拣起了这个标签。在这场存在主义运动兴起的过程中，萨特被视为存在主义的教皇，而波伏瓦则被封为圣母。波伏瓦也成为了萨特麾下的一员战将。

1945年是西蒙娜颇为忙碌，收获甚丰的一年。她于同年二月应邀去西班牙与葡萄牙作关于占领时期的报告。她在这两国的逗留期间，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摧残给两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回到巴黎后，她撰写了系列报道。在文章中，她谴责了战争，也批评了政府在战争中的行为。尽管这些文章的内容遭到了西

班牙、葡萄牙两国政府的干预，但波伏瓦还是将它们发表在米歇尔·柯里莱主编的《意愿》杂志上。这又一次充分体现了波伏瓦的一贯作风和对社会事务敢于介入的态度。

1945年9月，波伏瓦又出版了她的第二部小说《他人的血》。这部小说比《女客》更受欢迎。该作品主要描写了二战期间，巴黎被德军占领时期，法国地下抵抗运动的业绩。小说通过五个青年男女在被占领期，德国法西斯力量嚣张时期，每个人各自的人生选择，探讨了自由和责任的问题。小说中，这五个青年都是通过自我选择，决定自己的生活道路和生活意义。男主人公让在战前曾参加了共产党，积极组织了工会运动。但后来因为自己的朋友雅克在罢工中的牺牲，使他因不希望见到他人的血而退出共产党，不再过问政治。但在巴黎被占领时期，法西斯甚是嚣张，让又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他留在了巴黎，建立了地下抵抗组织，领导巴黎抵抗运动的战士，开展反法西斯斗争，为保卫巴黎，他作出了行动和选择。小说的女主人公海兰娜在战前是一个只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自由主义者。她只关注个人，从不认为自己与社会有关系。战前，她在爱情上作出了自我选择。她抛弃了自己的男友保尔，而选择了保尔的朋友让。让不爱她，但她认为，自己选择让是她个人的自由，她可以作这

种选择，而并不需在乎让的看法。在二战期间，让被征入伍上了前线。海兰娜通过关系把让调至了巴黎，她不愿让男友牺牲在战场上。结果让与她发生了冲突，最后两人决裂。在沦陷区，海兰娜试图通过求助于占领军，离开巴黎到柏林去。后出于民族的自尊心，她放弃了这种打算，转而参加了地下抵抗运动组织。她的女友——犹太姑娘要遭到法西斯的逮捕。为了保护女友免遭迫害，她开始了营救工作。后来海兰娜在执行任务时牺牲。在这部小说中，西蒙娜提出了存在主义的文学主张，提出了自我选择的意义。她在小说中主张自由选择要与社会责任、人类命运结合起来。

1945年，小说《他人的血》和剧本《白吃饭的嘴巴》的出版与上演，在法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推动了这一时期法国的存在主义运动。西蒙娜·德·波伏瓦也和萨特一样，成为了法国存在主义运动的重要代表。诚然，在这场存在主义运动中，由于萨特的声名显赫和宏大影响，使评论界对波伏瓦的作用，有些估计不足，并常把她视为萨特的追随者。事实上，虽然，在法国存在主义运动的发展时期，西蒙娜常常追随在萨特和加缪的左右，但她确也以她自己的方式积极地参与和推动了这场运动。1945年12月，她曾作了两场关于存在主义小说和哲学的演讲报告，因为当时法国的报界以及社会舆论对存在主义

哲学的毁誉、对萨特和波伏瓦的人身攻击越来越厉害。当时对存在主义的攻击来自四面八方，人们纷纷指责存在主义哲学是悲观主义、虚无主义的哲学，是不道德的哲学，是毫无价值的、下流的、卑鄙的哲学。有人甚至攻击波伏瓦与萨特的爱情生活，他们把西蒙娜说成是一个具有放荡习性的女怪人、女疯子。针对社会舆论对存在主义哲学和小说的曲解，波伏瓦举行了这两次报告会。她要为存在主义哲学辩护。她认为存在主义哲学教给了人们“全面深刻地面对责任感”的意识，每个人都应该在行使自由的同时，承担这个责任。她驳斥了有关存在主义是没有道德的哲学的错误观点。继波伏瓦之后，为了回击社会舆论，萨特也作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讲。萨特为存在主义哲学辩护道：“我们所理解的存在主义是一种怎样使人生活过得去的学说。”他认为，存在主义告诉人们的是：“除了他自己外，别无立法者。”“一个人不是别的，只是自我设计，只存在于自我实现的过程中，除了全部行动，除了生命，就一无所有。”“存在主义是乐观的，它是一个行动的学说。”

实际上，波伏瓦和萨特在20世纪40年代所倡导的存在主义哲学，主要是要使战后的法国人能心平气和地接受现实、面对现实。他们所倡导的自我选择和行动是为了给人们提供克服精神危机、振作精神的

思想武器。他们在哲学中揭示现实世界的荒诞性和人存在本身的荒诞性，其目的不是宣传虚无、消极厌世思想，而是揭示现实本相，引导人们去思考如何去正视和对抗这种人类状况的荒诞性。因为人置身于什么时代、什么社会、什么境况，对于这一切，人类虽无法选择，但人在任何时代、社会中都可以作出自我选择，这则是真理。因此波伏瓦和萨特提出了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命题：存在先于本质，人通过选择可以赋予存在的意义、价值。当然，毋庸置疑，存在主义哲学确有否定当时社会现实的倾向，但它却是对二战后人类生存境况的批判性认识。

40年代中叶是法国存在主义文学运动形成、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时期。萨特和阿尔贝·加缪无疑是这一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而西蒙娜·德·波伏瓦也自始至终地参予了这一运动。由于她与萨特的特殊关系，她无疑在存在主义文学建立的过程中也倾注了其心血和努力。在这一时期，她在其创作的一系列作品中，都力图表现某些存在主义哲理。1946年，她在继《女客》、《他人的血》之后，又创作了第三部小说《人总是要死的》。这部小说在波伏瓦所有的小说作品中，是一部存在主义思想倾向最明显的作品。该作品完成于1943年至1946年，历时3年。此期间，波伏瓦经历了战争、沦陷和战后清肃法奸等历

史事件。她在作品中尝试用一种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部小说的主人公福斯卡被誉为浮士德式的人物。波伏瓦通过这个人物的经历，探讨了人类的生存境况问题。在小说中，福斯卡是个长生不老的传奇式人物，在故事的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他的踪迹。他跨越了6个世纪，周游世界各国，他是历史的见证人，代表着一种永恒的存在。他曾亲眼目睹了几百年来欧洲历史的风云变幻，经历了无数次战争、无数次个人爱情生活的不幸。他是永存的，而他周围存在却都只有一瞬。他自己有无限的权力，他本人也多次使用这些权力，然而他最终却无法改变历史的进程，无法改善人的生活状态。他无法用自己的权力去恢复公正，使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人复活。他悲哀地发现，历史虽然在前进，然而现实却没有改变。他的永恒存在并没有什么意义。福斯卡最终豁然意识到生存本质的虚无，而人的瞬间存在，在他看来也未必一定意味着不幸，只要他曾经有过行动和选择。在这部小说中，波伏瓦用存在主义观点分析了历史和现实，论述了人类生存的本质和意义。然而在小说中，她在对人类历史的远景进行解释中，却不免落入了历史悲观主义循环论的窠臼中。

1943年至1948年，西蒙娜·德·波伏瓦在萨特的影响下，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她共

写了三部小说、一个剧本和三部论著。她通过这些作品，阐述了其存在主义观点，并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与萨特一样，她成为了一位“介入”作家。她放弃了以往的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强调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主张文学要干预政治和生活，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1947年，她在论著《模棱两可的伦理学》中，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她主张作家应该对他周围社会的变化有所作为。她希望作家要为改变人的社会状况和人对自身的观念而作出自己的努力。这一思想的变化，使得波伏瓦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有了变化。她开始走进了公众的生活之中。公众开始接受了这位介入女作家，并把她视为继萨特和加缪之后，法国存在主义文学运动的第三位重要人物。西蒙娜·德·波伏瓦这个名字，不仅在法国已家喻户晓，而且在欧洲其他国家及美国等世界其他地方，也广为人们所熟悉。

第八章 美国之行

二战后，整个欧美文坛黯然沉寂。而这时，被誉为世界大都会的巴黎却独报佳音。一个新的文学思潮——存在主义文学在法国独放异彩。它的出现给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美文学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新的契机。人们不约而同地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这个孕育并产生新思想的地方。随着存在主义文学思潮在欧美各国的影响日益扩大，这一派别的创立者萨特、加缪和波伏瓦自然就成为了人们关注的新闻人物。各国纷纷邀请这三位存在主义文学大师前去访问讲学。从1945年起，萨特、波伏瓦和加缪应邀到过许多国家的大学里去访问、讲学，向人们介绍法国存在主义哲学的理论和存在主义文学的发展情况。而在被邀请的这三位存在主义文学作家中，唯有萨特和波伏瓦倍受人们的青睐。萨特被誉为存在主义文学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和创建者，而波伏瓦则因为与萨特的伙伴加伴侣关系，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1946年5月，波伏瓦和萨特应邀去瑞士讲学、访问。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人们都特意把他俩安排在一起。在人们的心目中，波

伏瓦和萨特是密不可分的。

然而当鲜花、掌声和荣誉在波伏瓦和萨特的生活和事业的航道上潮水般涌来的时候，他们的爱情之舟在感情的海洋上会遇到波澜吗？也许波伏瓦和萨特在此时都不曾想到，在他们先后各自的美国之行中，除了与美国知识界人士的文化和观光漫游外，他们各自还在感情上另有收获。

1946年，波伏瓦在接到了去美国讲学、访问的邀请后，便开始着手筹划这次远行。1947年1月25日，她终于登机赴美。这次赴美，她准备在美国谈有关战后作家的伦理道德问题。这是一个触及所有知识分子的敏感问题，在对该问题的认识上，波伏瓦想与美国知识界同行达成共识。同时，她还想借此宣传她和萨特所主张的作家应该介入、干预政治生活的思想。

波伏瓦抵达美国的纽约后，受到了热情欢迎。她的来访受到了新闻界热切的关注。纽约的记者在《纽约人》等报纸的显目位置上，刊登了有关波伏瓦的专访文章。记者们把波伏瓦称为“让·保尔·萨特志同道合的女伴”和“最漂亮的存在主义者”。纽约报界记者尤其对波伏瓦和萨特的私生活感到好奇，常常是请波伏瓦谈谈她的生活，而不是其存在主义哲学观点。在美国第一大城市纽约的逗留访问期间，为了多了解

些美国的文化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波伏瓦跑遍了整个曼哈顿和布鲁克林地区。后来她还请美国黑人作家理查德·怀特带她访问了纽约黑人区。波伏瓦在纽约访问期间，感受到了美国是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国家。美国人，尤其是青年人总是乐观自信。她后来在其访美结束后所写的《美国的日日夜夜》一书中谈到了当时的这种看法：“美国宛如一个吓人一跳的大玩偶盒”。

波伏瓦于1947年2月在美国纽约几所大学里作巡回讲演。在讲演中她反复强调作家应介入生活，应有所选择，应有责任感。她还强调人的自由。但她认为人的自由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是真实的、具体的。人的自由必须要介入生活，必须趋向于一个目标，并尽力要给世界带来某些变化。她认为美国人其实本来就是存在主义者，只是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罢了。波伏瓦的巡回演讲在纽约的所有大学里得到了公众的赞誉。通过波伏瓦的介绍，美国人了解到了法国的存在主义文学其实宣传的不是虚无主义悲观厌世的思想，而是乐观主义的人生态度。

波伏瓦在此期间也不断应邀出席纽约知识分子阶层举办的一个个酒会。她广泛结交纽约知识界的同仁，她结识了作家哈里森、美国黑人作家理查德·怀特。她和怀特还讨论了美国的种族歧视和黑人问题。在纽约期间波伏瓦已开始着手写一本有关妇女问题的专著

《第二性》，为此，她曾参加了史密斯学校的关于“妇女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的学术研讨会。她利用这次机会同美国各界杰出的妇女代表探讨了妇女地位问题。

1947年2月底，波伏瓦在纽约的巡回演讲结束后，又应邀去芝加哥作演讲报告，在该城市她计划逗留36小时。临行前，一位美国朋友把一位专写芝加哥社会底层生活的小说家纳尔逊·阿格林在芝加哥的地址提供给她，这对波伏瓦是很及时和需要的。因为此行中，她很想多了解些美国社会底层人的生活状况。于是来到芝加哥之后，波伏瓦就主动与阿格林取得了联系。波伏瓦约纳尔逊·阿格林在芝加哥最大的饭店“帕麦尔之家”见面。他们第一次见面因语言的隔阂，未能作很长的交流，但两人相约在波伏瓦巡回讲演后，再来见面。

第二次见面后，波伏瓦与纳尔逊·阿格林却谈得十分投机。在阿格林的陪同下，波伏瓦参观了芝加哥市的动物园、赛马场，他们甚至在夜间还逛了该市恶名昭著的酒吧和夜总会。此行中，阿格林使她看到了美国下层社会的阴暗角落，接触了活生生的社会现实。这次会见中，纳尔逊·阿格林对这位大名鼎鼎的存在主义女作家产生了好感。在他的印象中，她是一位十分平易近人的女性，为人热情、谈吐优雅、有教养。

尤其令他难忘的是他发现，她还是个非常风趣、幽默调皮的健谈者。而西蒙娜也对这位身高一米八五，身材魁伟，棕色头发的美国小说家产生了好感。她好像被阿格林所具有的那种阳刚的男性气质和魅力所牢牢吸引。

自此两人交往不断，会面频繁，双方在不知不觉中，渐坠爱河。阿格林，对波伏瓦来说，就像一个从小说、电影里走出来的人物，且越走越近。

这位有着斯堪的纳维亚血统的美国男子，既有着电影男主角般的仪表，又有着成熟男人的深沉，而且是一位在芝加哥文坛上小有名气的作家。他的一部描写美国大都市中社会底层那些被社会抛弃的人之遭遇的作品——《内昂的荒漠》刚刚获得成功。但在此之前，他与前妻早已离婚，多年来，一直住在芝加哥的一个贫民区里，过着单身的生活。他的早年生活与波伏瓦的成长经历相比，真是大相径庭。阿格林在青年时代就酷爱写作，后进入伊利诺斯州立大学，主修新闻专业。他的大学时代，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因此他亲眼目睹了大城市中，成千上万的人们为了谋生而经历的万般痛苦。基于此，他认为自己在课堂上所学到的新闻学课程派不上用场，于是放弃了学业，开始了浪迹天涯的生活。流浪中的生活曾使他在二战前，因无业流浪罪而被投进监狱。出狱后不久，又因

酷爱写作而不得不靠偷窃来拥有一台打字机，而被再投入狱。入狱这年是1929年，他22岁，当时正值西蒙娜通过了法国教师资格考试。流浪的生活使阿格林经常得以与社会底层的流浪汉、乞丐、妓女、歹徒、懒汉接触，在与他们的厮混、闲聊中，他终于发现了所要写的东西，所要说的话。1931年他结束了漂泊，重返芝加哥，专心于写作。同年，他的一个根据自己经历为背景的短篇在芝加哥一家报纸上发表。该短篇的发表使他受到了出版商的关注。此后，伴随着成家、离婚、应征入伍，他已经逐步走上了一条职业作家的创作道路。

和纳尔逊·阿格林的交往，使波伏瓦体验到一种似曾相识又从未有过的激情。阿格林给她带来了一种新鲜的感觉，使她仿佛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情感世界。

波伏瓦自与萨特相识到相爱以来，俩人一直保持着那种契约式的爱情。在她与萨特的爱情中，理智与情感、世俗与超越常像水中的浮标一样，在一个界面上下波动。特别是1934年，由于奥尔加的介入所导致的“三重奏”生活，在她的内心深处，一直都留下难以抚平的淡淡的伤痛。但是由于契约式爱情的本质所追求的那种精神和灵魂的高度融合和共鸣，又使她自始至终地在自己的心目中，给萨特留下了永远的位置。多年来，作为一个具有强烈独立意识的女性，

波伏瓦赢得了这个由男性来统治的世界的承认和尊敬。她为此也感到由衷的骄傲。但作为一个自然的女性，她也从来自异性的眼光中，体会到一种不被爱怜、保护和同情的冷默和否定。而且这种体验也能被她依稀从萨特身上感受到。这一点更能从萨特1939年应征入伍时，给他另一个情人的一封临别信中得到证实。当时他在信中写道：“我不太怜悯善良的海狸，她总是那么勇敢和完美，令我心碎的是你在安那诺易西那里的孤独和痛苦。”也许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无言的惆怅，使波伏瓦的心中一直都默默地保留着那种对完整爱情的渴望。

阿格林的出现，对波伏瓦这次美国之行来说确实是始料不及的。波伏瓦从他爱情动机之单纯、对她感情之专注、深沉中真正体验到一种刻骨铭心的爱，一份倾注一切的完整的爱，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甜蜜和满足。她似乎从阿格林身上终于找到了她曾经在梦中渴望的东西。这个大洋彼岸陌生国度中的异国情侣，翻涌起了她胸中平静多年的波澜，使她心中迸发出一种不顾一切、任凭冲荡的激情。这种爱完全不同于以往的那种超凡脱俗和自由、独立，它强烈地渴望完全占有对方全部的感情，又是何等的愉快和世俗。

然而此时的西蒙娜·德·波伏瓦已经是一位39岁的成熟女子。她的人生阅历、思想意识都非昔日可

比。作为一个颇具影响的存在主义女作家，她的独立意识和自由主张，也绝非是一日而形成的。这一时期，她的全部精力几乎都投向了关注社会、参予社会。她的重要巨著《第二性》也正在撰写之中。正是这种非凡的人生经历，使她绝不可能以简单的方式对待她与阿格林的爱情。于是在醉人迷痴的两个月后，波伏瓦终于决定返回巴黎。

1947年4月底，波伏瓦与阿格林含泪话别。临行前她告诉阿格林，她肯定会回来的，但立刻她又意味深长地说道：“我的生活与法国永远密不可分。”但是在当时，纳尔逊·阿格林未必会全部理解这句话的含意。

从美国归来后，波伏瓦和萨特又投入到紧张的创作和社会生活中。这一时期，一方面波伏瓦继续与异国的伴侣阿格林鸿雁不断，一方面萨特也与美国好莱坞的一位女演员陶乐赫丝爱得火热。陶乐赫丝是萨特在1945年1月，以《战斗报》和《费加罗报》特派记者身份赴美访问时结识的。与萨特热恋后，她执意要为他而与自己的第二位丈夫离婚，后因萨特不愿扰乱各自的生活平衡而遭拒绝。这样由于波伏瓦和萨特各自的美国之恋，使他们此时的契约式爱情又呈演出一轮更为复杂的“三重奏”。因此，尽管这一时期，萨特和波伏瓦，两人由于共同的写作和共同的探讨问

题，在生活上和精神上，更加走到了一起。但在情感的交流上，两人却开始感觉出彼此的疏远。这种感觉正如波伏瓦后来在其《年富力强》一书中提到的：

“萨特变得沉默寡言，我也是如此。我恐惧地问自己，我们会不会变成两个陌路人？”对波伏瓦和萨特这段时期的爱情生活，我们可以这样风趣地认为，这是他们继美国之行后，命运之神再次给他们出的一道难题，是对他们契约式爱情的考验，顺情乎？合理乎？1947年6月，陶乐赫丝从美国远道而来。萨特不得不放下手边的工作，陪同她到勒阿弗尔去旅行。而波伏瓦在孤寂中，则更加思念远方的纳尔逊·阿格林。于是在1947年8月，波伏瓦离开巴黎，启程赴美。

在芝加哥阿格林的寓所，波伏瓦与阿格林共度了两周的快乐时光。他们共同生活，一同工作，不停地畅谈，甚至一同参加朋友的聚会。同阿格林在一起，西蒙娜感到轻松、愉快、温暖、幸福，绵绵情意，终生难忘。而阿格林也感到能与一个像她这样的女作家分享充实的生活也实在美满。于是他向波伏瓦提出了永远留在他身边的请求。对于这个请求，波伏瓦一直在做着自欺式的回避。与阿格林的交往，她完全陶醉于爱情的愉悦之中，从心里也渴望这种与情人的厮守相依，但真作出选择，实在下不了决心。她心中还是有萨特、还是有事业、还是有她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这种复杂的心理，是她几十年生活经历的积淀，既非一般人所能理解，又非一时能够说清，或许只有萨特能够理解，而阿格林能读懂吗？至此她只能感叹，情人未必是知己，知己未必成情人。

离美归国后，波伏瓦仍像往常一样，在巴黎蒙巴那斯的花神咖啡馆写作。在这里，她根据访美感受撰写了随笔《美国的日日夜夜》。在此期间，她还经常与萨特一起共同讨论他的剧本《肮脏的手》初稿，她也让萨特阅读了她的《美国的日日夜夜》手稿。这期间，她还陷入了对远方的阿格林深深的思念中。每次收到远方情人的来信，她都要伤心地流泪。这种令人心碎的矛盾情怀，在她这一时期寄给阿格林的情书中，被真实地记录下来。她曾在封夹着淡紫色风铃草的情书中写道：“我真是坐卧不宁，想再一次融化在你的怀抱中……你是我唯一的丈夫。”然而一方面她又尽力想向阿格林解释清楚，她与萨特的关系。她曾在信中告诉他：萨特可以给她巨大的帮助。她需要他，她不能“把萨特搁在一边”，他们所结成的关系是坚不可摧的。

1948年4月，波伏瓦第三次赴美。这次她与阿格林乘船航行于密西西比河，游览了两岸的自然风光。他们还一同去了美国南方，随后又游历了新奥尔良、尤卡坦半岛、危地马拉和墨西哥。在这次相会中，

阿格林开始逐渐意识到，自己正在步入缪塞的后尘，波伏瓦是一个乔治·桑式的女人。这种想法使他对波伏瓦的感情中，掺入了一丝酸涩。该年7月14日，波伏瓦在得知萨特的一个电影脚本需要她进行修改时，执意要即返巴黎。临行前她与阿格林发生了争执。阿格林提出要与她结婚的请求，竭力阻拦波伏瓦返回法国。波伏瓦则据理力争，她终于向阿格林明确地表明了心迹：她打算改变她的生活方式。第三次赴美以不欢而散告终，波伏瓦怀着内疚矛盾的心情踏上归程。在情感与事业的天平上，她又一次面临了选择。然而这一次，指针向事业倾斜。

返回巴黎后，波伏瓦见到了萨特，两人立即开始着手修改电影剧本。但这时，远在美国的陶乐赫丝又从美国打来电话，她告诉萨特，马上要来巴黎与他相会。于是，为与陶乐赫丝相聚，萨特不得不将电影脚本和波伏瓦搁在一边，再次从工作中抽出时间，陪同陶乐赫丝去南方旅行。此时，孤单的波伏瓦不得不独自完成着剩下的工作。失望之余不由得又唤起了她对纳尔逊·阿格林的深切思念。她把这些思念，再次写入了寄给阿格林的书信中。

1949年6月，为了作最后的努力，阿格林终于乘船来到巴黎与波伏瓦相聚。欣喜之余，波伏瓦陪他游览了巴黎。此后两人动身去意大利、突尼斯、阿

尔及利亚旅行游历。从巴黎返回美国后，阿格林完成并出版了一本小说，而且荣获了普利策奖。他将这一成功归之为与波伏瓦的爱情。与此同时，波伏瓦的论著《第二性》的第一卷也在伽里玛出版社和《现代》杂志上相继出版和发表。此时，她又在着手撰写她的第四部小说《名士风流》。不久她又计划她的第四次赴美。

这次赴美，波伏瓦仅与阿格林共度两个月。由于值1949年底，朝鲜战争刚刚爆发，人们误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于是不论是在美国的芝加哥，还是在法国的巴黎，人们纷纷涌向杂货店，排队抢购食品。由于担心波伏瓦的安全，萨特来信请她启程返法。于是波伏瓦又辞别阿格林，回到了巴黎。对待波伏瓦的这次启程，纳尔逊·阿格林似乎已经超脱多了。从以往波伏瓦多次的情感反复中，他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了自己的尴尬地位。他相信波伏瓦对自己的纯真的感情，也明了她那种自相矛盾的痛苦心态。但他实在理解不了波伏瓦与萨特之间的所谓契约式的爱情。他搞不清他所爱的女人把他和她的事业、把他与萨特放在了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中。他对波伏瓦既要两情相悦，又要在爱情中保持平等、自由和独立感到由衷的困惑，更对几次求婚均遭到波伏瓦的拒绝而恼怒。他在感情上，不愿去勉强波伏瓦，他已经思考了两天，

囿于现实，看来他只能放弃波伏瓦。他实在不明白，其实他需要的只是波伏瓦的承诺和感情，而绝不是她的社会名声和地位，但这怎么就这么难？

1950年10月，波伏瓦又第五次赴美与阿格林相会。在逗留期间她还完成了论著《必须烧毁萨特的著作吗？》。然而这次相会中，阿格林却告诉她，他准备与前妻复婚。对于阿格林的这一番话，波伏瓦多少有一种万念俱灰的感觉。正如她后来在《年富力强》中写道：“当时，我不知道最令我惋惜的是什么？一个男人、一片风光或是我自己？”但最终波伏瓦还是赞同了阿格林的最后选择。尽管理智告诉她，这也许是一种最明智的做法，然而当离别期至时，波伏瓦还是流下了她遗憾、痛苦的泪水。

波伏瓦回到巴黎不久，萨特也同陶乐赫丝中止了交往。自此，一对半世的伴侣又回到二重奏的合作关系中。经历了美国之行的情感风波后，波伏瓦和萨特的契约式爱情又经历了一次历史的锻炼。顺情乎？合理乎？实在难以回答。对此问题，不仅纳尔逊·阿格林回答不了，恐怕当时其他许多人也同样疑惑不解。这种疑惑正如阿格林在后来的文章中写到的：“什么是契约爱情？它是怎样的？它相对于什么而言？”阿格林始终弄不明白，一个女人为什么仅为了要忠实于爱情契约而却要割舍自己的情爱。1981年，阿

格林由于接受记者关于他和波伏瓦爱情问题的采访，勾起了对往日难忘经历的回忆，从而导致心脏病的突发，在寓所里孤独地逝去。他一生三次结婚，三度离婚，但始终对波伏瓦难以忘怀。令人遗憾的是，他是带着“波伏瓦为什么要这样”的疑惑，离开人间的。的确，阿格林的疑惑确实也代表着许多人的疑惑。波伏瓦与萨特的爱情契约究竟是如何的不可理喻？

第九章 《第二性》及其他

“我一直犹豫很久不能决定要不要写一本关于女人的书……人类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男人不就女人的本身来解释女人，而是以他自己为主相对而论女人的，女人不是天然进化发展形成的一种人类。……对男人来说女人所表现在他们眼中的只是一个性感的动物，她就是“性”。其他什么也不是……。男人是主要的，女人只是附属品而已。……我们在目前女人的处境中如何才能获得成就？在我们面前展开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哪一条路是不通的？如何能从处处依赖男人的环境下变成独立？什么样的环境限制了女人的自由？她们如何能去克服那些困难？这些都是我不得不提出的最基本的问题。这些只代表着我对女人命运问题的关心……。”

这是波伏瓦的论著《第二性》序言中的一段话，是序言所要交待的波伏瓦决定要写一本关于女人的书的意图、缘由和想法。的确，正如序言所说，波伏瓦一直对妇女在社会中的境况，妇女的命运问题非常关心。儿时，她曾耳闻父亲乔治对母亲的不忠，他不断在婚约上“捅口子”。青年时代，她又目睹了女友萨

萨的悲剧，这位女友是因家人反对，不能自由选择自己所爱的对象成婚抑郁而死。而她本人的情感生活一直波澜不止，在她与萨特的爱情生活最初阶段，不断有一些新面孔的女性出现，而她仅仅因选择自由独立的生活方式，就不断遭到人们的非议。从母亲的婚姻生活、女友的爱情悲剧和她本人的情感经历中，她认识到了妇女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的处境、境况和她们的命运。随着阅历、思想的丰富和成熟，她更感到即使在进入了20世纪40—50年代，即二战后，妇女属于从属地位而遭受到男性歧视，一直被视为第二性的状况并没有改变。妇女在政治、经济、社会、家庭、婚姻、爱情、事业等诸多方面都遇到了一些棘手的难题。作为女性，出于对自身及妇女境况和命运的关心，同时也出于存在主义作家的责任感，波伏瓦决定要为女人写一本启蒙的书。这本书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迄今为止强加给女性身上的性格差别都是荒谬的成见。她要为女人指出如何从处处依赖男人的环境下走出来的途径。这部书正是波伏瓦为了让当代妇女更了解自己的处境、思考自己的命运而著的。

《第二性》从构思、撰写到完稿历经了两年半的时间。1947年4月，波伏瓦在美国纽约访问讲学时，开始构思写作。1948年2月《第二性》中的“女人与神话”一节发表在法国存在主义文学刊物

《现代》杂志上。1949年6月,《第二性》第一卷《事实与神话》在伽里玛出版社出版。1949年,《现代》杂志又开始分期登载《第二性》第二卷的部分章节。1949年11月《第二性》第二卷《今日妇女之生活》又在伽里玛出版社出版。《第二性》一书出版后,人们都争相购买,此书因此而成为该年的畅销书。与此同时,人们还争购《现代》杂志期刊,偌大的巴黎,被此书的出版直搞得洛阳纸贵。然而巨大的影响也使各种对此书的议论成为了一个个热门话题。公众对此书的评论褒贬不一。195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莫里亚克就曾在1949年当月的《费加罗报》上,指责波伏瓦的《第二性》是:“从文学上看,我们已达到下流的极限。当我们还是幼童时,大人们为使我们呕吐,给我们灌进肚里的正是这种反胃的东西。”但《巴黎竞赛》报的评价则给予了波伏瓦的《第二性》以很高的赞誉。该报的记者评论道:“一个女人号召妇女们争取自由。西蒙娜·德·波伏瓦无疑是出现在男人历史中的第一位妇女哲学家。”然而《第二性》在出版不久就横遭被列禁书之祸,这一结局多少也反映出它对当时人们思想的影响之大,它对当时社会道德的冲击之猛,以及它所受到的批评、责难较之于它当受的颂扬、赞誉是如此之多。

《第二性》一书实际上并非像当时人们所想象的

那样是一本宣淫诲盗之书，它实在是一部非常严肃的理论专著。在书中，它系统地提出了当今社会中有关女性生理、心理、社会处境、社会地位及命运等方面的最基本的问题。这些问题诸如，妇女为什么退到比男人次要得多的地位？什么是女性化？女人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女人应该怎么学会生存？等等。波伏瓦在提出这些问题的同时，还分别以生理学、心理分析学、社会学以及哲学的观点，对这些问题的本质进行了探讨。她还详细论述了从原始时期到法国大革命之后，西方妇女所处的社会地位的历史演变过程，论述了妇女身心发展的过程，以及她们应当如何摆脱被奴役的状况去寻找自身的出路等问题。该书的重要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提出了“女人并非生来就是，而是后天形成的”观点。在这里，波伏瓦用科学的态度探讨了社会的各种规范和道德价值取向，引导了一个女孩逐渐变成了一个女性的社会化过程，揭示了妇女成为次于男人的第二性的原因。它的高明之处正是把第二性的问题同法律、宗教、习俗、传统对妇女的压迫联系起来，从社会根源上去挖掘第二性形成问题的关键和核心。另一方面它又提出了妇女解放，妇女如何才能获得自由、独立的人格尊严，如何才能在实质上获得生存自由等出路的设想。它指出，女性要真正获得自由和解放，就必须对传统的爱

情观、价值观、道德观进行重新估价，从而确立一种新的价值体系。而正是这一结论准确地戳中了传统的社会道德规范体系的痛处，才导致了《第二性》遭受到灭顶般的诋毁。

《第二性》这部著作，在波伏瓦一生的创作历程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这部著作是波伏瓦思想体系成熟时期的产物，是她这一时期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结晶。从1943年至1949年，波伏瓦的思想观念有了重大的转变。她放弃了战前一贯坚持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而彻底转向了存在主义。她坚持存在主义的干预、介入思想，呼吁作家要有社会责任感。正是这种思想上的转变，才引发了她对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和探索，激发了她欲解答困扰妇女自身诸种问题的热望，促成了她这部关系妇女自身命运、反映妇女切身问题、涉及妇女自我解放的划时代巨著的问世。也正是这部巨著奠定了西蒙娜·德·波伏瓦在法国思想界的地位。自这部著作发表后，在法国公众心目中，波伏瓦不再是萨特的“小伙伴”、“追随者”，而是著名的哲学者、思想者，是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驱。更加之她本人的身体力行，与萨特一起，创立了一种新型的爱情形式，因此，她被视为西方妇女个性解放的楷模。

波伏瓦的论著《第二性》于1949年在法国出

版时，虽曾轰动一时，但又旋遭查禁。当时的舆论界因对它褒贬不一而大加争论，但终于是责多于赞。而该书于1953年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后，则再次引起了轰动，成为了最抢手的畅销书。此书对当时美国掀起的妇女解放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被称之为“有史以来讨论女人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甚至被美国女权主义者尊称为西方妇女的“圣经”。同样，这本书在美国也被公认为是促使西方妇女女性意识觉醒的启蒙作品。自从《第二性》被译成多国文字后，西蒙娜·德·波伏瓦成为了拥有最多读者的女性作家。该书在西方世界所引起的震动和反响，不亚于一场战争和革命。该书在观念上向西方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的传统道德提出了挑战，为西方妇女解放运动指明了方向。

《第二性》发表后，波伏瓦从1949年开始着手撰写她的小说《名士风流》。这部小说从构思、完成到出版，历经5年。该书发表于1954年10月，两个月后获得当年的龚古尔文学大奖。

在波伏瓦创作《名士风流》期间，法国存在主义阵营内部因政见不统一，出现了分歧。从1945年以来，法国存在主义文学组织，一直以《现代》杂志为论坛，宣传存在主义哲学观点、主张。《现代》杂志的创办人是萨特和莫里斯·梅洛·蓬蒂，阿尔贝·

加缪是后来才加盟的。1951年，由于政治上的分歧，《现代》杂志的编委会内部出现了矛盾、分歧。萨特在这一时期与法共关系密切，他自称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他在冷战期间，站在共产党一边，认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意识确切而必要的体现”。而加缪在这一时期则对法共以及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他的这一时期创作的作品《反抗者》因遭到了萨特的否定，继而引发了加缪与萨特之间的论战。这一论战的结果就是使这个延续了七年之久的友谊宣告破裂。这样，分裂在两位存在主义领袖之间发生了，而这种分裂又是政治分歧造成的。加缪曾指责萨特总是把自己的坐椅放在了顺乎历史前进的方向。而萨特则谴责他宣传暴力专政，指责加缪是一个资产者、自由派思想家。但无论如何，他们的分裂标志着法国存在主义文学运动的趋于衰落。

从1949年至1954年，波伏瓦的个人生活时而落入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地，时而又出现了柳岸花明又一村的转机。1950年，美国作家纳尔逊·阿格林与波伏瓦结束了三年的异国之恋。这次情感经历，一度曾使波伏瓦陷入了悲伤痛苦之中。她无法忘怀这段经历，并把它写入了小说《名士风流》中。1952年，一直与萨特分居的波伏瓦开始与《现代》杂志的新撰稿人克洛德·朗兹曼交往。这一年，44

岁的波伏瓦与比她小 17 岁的克洛德·朗兹曼开始了同居生活。在她的心目中，朗兹曼又占据了重要位置。在这段新恋情中，波伏瓦也曾担心过这会不会对萨特有所影响。但事实证明，萨特能够正视他们契约式的爱情。萨特在这段时期，正全身心地忙于他的社会事务。而波伏瓦则渐渐地对那些吸引萨特的政治活动失去了兴趣。她把主要精力又放在写作上，每天平均写作七个小时。

《名士风流》一书就写于存在主义组织内部出现分裂，波伏瓦本人的生活又出现新的转机期间。由于波伏瓦自始至终都参予了存在主义运动的全过程，自然对《现代》杂志编委们之间的分歧感到遗憾。于是她决定要在《名士风流》一书中，将《现代》杂志的团体，以及该杂志的经历，把她与美国小说家纳尔逊·阿格林之间的爱情，都写入作品中。

《名士风流》一书，在波伏瓦一生的创作中的确占据着重要地位。它代表着波伏瓦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是一部引人注目的作品。与其以往小说所不同的是，这部作品重点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一部分“左翼”知识分子精英的精神危机，揭示了他们在面临“说真话”与“干革命”这一抉择问题上的矛盾心理。这部小说无论在题材上、内容上，还是在表现方法上，都与《女客》、《人总是要死的》都有所

不同。《女客》主要是自传性小说，细致地描写了波伏瓦与萨特、奥尔加之间的“三重奏”生活。而《人总是要死的》则偏重表现哲理性的思考。只有《名士风流》既有自传成分，又有对存在主义运动内部分裂的反思，但更多地反映了二战之后，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在面对世界向何处去，西方知识分子应如何选择他们的道路问题上的思考和精神探索。因此，从这部小说中可以看出，在50年代里，波伏瓦对于发生于她身边的各种政治事件、各种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表现出了一种高度的关注和介入、干预意识。

如果说《名士风流》是以波伏瓦在二战后至1952年的生活经历为题材的话，那么小说中的一些人物就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相应的原型。在小说中，亨利是以阿尔贝·加缪为原型来塑造的。小说描写了亨利创办《希望报》的经过，以及他所遇到的来自左派和右派压力的夹击。小说中，亨利与法国左派运动组织的发起人，他的盟友罗贝尔之间发生了矛盾。他们曾在巴黎沦陷时期就携手从事地下抵抗运动，战后又共同参与一些社会政治活动，属于同一派别。但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幻，两人的政治分歧逐渐加大，最后被迫分道扬镳，亨利则被左派运动组织开除。小说中罗贝尔的原型就是萨特。他作为一个想有所作为的左翼知识分子，在战争中就有非凡的表现，成为地下抵

抗运动的领导人。战后他认为拯救西方社会，只能依靠集体的力量，因而倾向社会主义，站在苏联一边。在现实中，他也同样遭到了右派的攻击和左派的怀疑。最后他所领导的新左派运动，因得不到盟友的支持而失败。罗贝尔在其社会主义理想宣告破灭后，曾感叹道：“今天在法国，一个知识分子是无所作为的，我们想独立于两个阵营之外，其实却无能为力。”但他仍不会放弃自己的努力和行动。小说中通过亨利的经历，真实地反映了法国存在主义《现代》刊物的创办经过及存在主义文学组织内部政治分歧的过程。而通过罗贝尔的经历则深刻表现了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过程，同时也宣扬了法国存在主义领袖人物萨特一些积极的政治主张。小说中心理医生安娜和美国作家刘易斯则是根据波伏瓦自己和她的异国情侣纳尔逊·阿格林为原型构思的。在小说中，安娜与刘易斯的爱情故事虽然描写得生动感人，但在整部小说中，终归只是一个插曲，是一个次要的情节。因此，这部小说的社会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名士风流》在1954年10月出版后，《法兰西文学报》立即作出反映，对该作品及时给予了肯定。同年12月，该书荣获了龚古尔文学大奖。这次获奖对波伏瓦意义非同一般，它终于使西蒙娜·德·波伏瓦跻身于法国20世纪当代名作家的行列。这是这一荣誉给予她的最高承

认。

自1949年6月《第二性》的发表至1954年12月，波伏瓦因《名士风流》而第一次获龚古尔文学奖，在短短的5年中，波伏瓦的社会影响和声誉与日俱增。这是她一生的鼎峰时期。而这一时期，她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创作上，都逐渐摆脱了受萨特的影响。在思想上，她表现出了女性学者那种特有的对一些社会重大问题的纤细、敏锐的认识，表现出了她能抓住与自身有关的社会热点问题，并在这方面开拓其小题大做式的探索。而在创作上，她已跳出了原来的框框，扩大了自己的视野。这一时期，她已一改以往的内心体验式的创作风格，开始了积极地把握时代脉搏，及时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写实派创作。在思想和文学领域里，她都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子。

这一时期，她与萨特仍保持着相互的信任和坦诚。他们的合作，他们的事业越来越联系在一起而更加地熔融难分。他们契约式的爱情又经受了几度风霜雪雨的考验。在情感的历程上，他们始终保持着各自的自由和独立。回首当年方觉这独立的来之不易，这其中凝有多少忧愁、疑惑和伤痛，又溶有多少嘲讽、谩骂和围攻。但波伏瓦按照自己的选择走过了，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着。她拥有了自己独立的人格，确立了成熟女人的强烈的自我意识。她不论在事业上、情感上，

还是在生活上，已不再依附于任何人，她不再是他人的影子，她就是她自己——西蒙娜·德·波伏瓦。

第十章 世界漫游

自1955年开始到1967年，是波伏瓦和萨特在国际舞台上活动频繁，最为活跃的时期。这期间，这对相依共度大半生的伴侣，出访频频，开始了世界漫游式的社会生活。他们以这种方式，广泛参予国际事务，继续他们的事业追求。在世界许多国家，包括中国、苏联、古巴、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巴西、日本、埃及、以色列的土地上，都留下了他们珍贵的足迹。而这些国家的难忘印象，也在他们的脑海中永驻终生。

1955年，波伏瓦和萨特接受中国政府的邀请，访问中国。这是他们第一次正式受官方邀请的出访。9月6日他们抵达北京。九月是北京最好的季节，秋高气爽，清风怡人。波伏瓦和萨特在这美好的季节来到了令他们感到陌生、新奇和向往的东方古老国度。初到中国，在波伏瓦看来，周围的一切都那么陌生。因为来此之前，她对中国尚谈不上认识，如果说有些印象的话，则仅来源于一些介绍中国的英文读物。而她的所见却和书中的描述大不相同。当时新中国建立不久，举国上下都洋溢着一种乐观、向上、自信、奋

发的热情。波伏瓦在北京、上海、沈阳等几个城市，已经感受到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经济繁荣上的差距，但同时她也感受到了中国人的艰苦朴素蔚然成风。她看到了无论是政界要人还是普通百姓都身体力行，尤其是被当时中国人的务实实干精神所感动。两个月的中国之行使波伏瓦深切感受到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充满的那种自信和活力。回到法国不久，她就在《现代》杂志为他们这次中国之行而特开的专栏“中国今昔”上，发表了题为《长征》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波伏瓦从历史的角度对中国进行了研究。她曾写道：“它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而是一块实实在在的人间土地。在那里，人们刚刚摆脱了牛马不如的困境，正在为建设一个人的世界做着艰苦的斗争。”波伏瓦在这次中国之行后，改变了她以往对世界的看法。她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有了自己的感受。但中国的人口问题也的确引起了她的担忧。

波伏瓦和萨特于11月离开中国后，随后又在苏联逗留了一周。萨特曾于1954年访问过苏联，而波伏瓦则是首次来到这里。她对苏联这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印象更深。因为苏联在这一时期正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其经济的繁荣和人民生活的富足令波伏瓦感到震惊和意外。她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曾多次接受记者的采访。她还在苏联国家电台上发表了讲话。

此次中国之行和苏联之行，在世界范围内树立了萨特—波伏瓦这对伴侣形象。

50年代末，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东欧各国普遍酝酿着一种反苏的情绪。在波兰，人们发出请愿的呼声，要求被斯大林主义者于1948年关押起来的哥穆尔卡重新上台执政。而在这期间，匈牙利发生了苏联坦克入侵布达佩斯事件，匈牙利人民起来与苏联人进行了战斗。而在世界范围内，一些重大的悲剧性事件接连不断发生。在北非的阿尔及利亚，人民掀起独立运动。对其殖民地人民的这一要求，法国政府采取了强硬态度，悍然出兵镇压了那里的人民民族解放运动。法国当局还劫持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乘坐的专机，逮捕了其领导人蓬·贝拉。此外，在美国掀起了反共产主义、排除异己的麦卡锡主义运动。大批的亲苏、同情共产党人的知识分子遭逮捕。对这一时期的国际紧张局势，波伏瓦深感不安。这一时期，她一方面反对斯大林主义下的专制，在对待苏联的问题上与萨特产生了分歧。另一方面她又反对美国的麦卡锡主义，谴责他们排除异己的做法。尤其是当她得知纳尔逊·阿格林因同情共产党人而被吊销了护照，则更是愤怒不已。她对美国失去了幻想，认为美国就是种族主义。在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问题上，波伏瓦和萨特等一些左翼知识分子起来抗议法国当局悍然发

动旨在镇压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阿尔及利亚战争。波伏瓦因站在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独立的立场上，遭受到周围人的许多攻击，有人谴责她背叛了自己的祖国。这一时期，波伏瓦认为欧洲已进入了充满暴力、压迫、侵略的阶段，因而心情无比郁闷。她只能用写作来排遣内心的苦闷。此间，她用18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一部自传性回忆录《一位良家少女的回忆》。

1958年5月，阿尔及利亚再次发生骚乱。法国当局成立了救国委员会。6月1日，国民议会授权戴高乐组阁，法国第五共和国诞生了。戴高乐是主张武力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强硬派。为此，波伏瓦和萨特对戴高乐的重新上台持否定态度。他们和左翼知识分子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反政府示威游行。波伏瓦这时开始在法国最著名的报纸之一《快报》上发表了数篇呼吁政府立即制止对阿尔及利亚采取敌对行动的文章。1959年同她共处7年的同伴克洛德·朗兹曼向她提出了分手，这提醒了波伏瓦她已进入了老年。这一年她已步入了第51个春秋。在此前她尚没有意识到，暮年这么快就来临了。她颇为伤感，陷入了孤独境地。1960年1月4日，她又闻知加缪在一次车祸中丧生，极度悲哀的同时，死亡的阴影又再次笼罩着她。这是波伏瓦一生中最伤感和孤独的两年。她在这一时期撰写了回忆录《年富力强》，回忆她从1

1929年到1944年这段期间的生活。1960年1月，古巴的《革命报》主编弗朗基邀请她和萨特去哈瓦那访问。

1960年2月22日至3月20日，波伏瓦和萨特对古巴进行了访问。这次古巴之行又重新唤起了她投身未来的渴望。在此行中，她了解了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她认为古巴是一个真正的、自由的、尽责的社会。波伏瓦、萨特与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建立了私人友谊。古巴之行使波伏瓦欣喜地感到，她已置身于世界的名人之列，有许多人都把她视为盟友。自此，她又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渴望。从古巴返回巴黎的寓所时，波伏瓦惊喜地发现纳尔逊·阿格林已在寓所里等她。原来他是在波伏瓦和萨特出访古巴期间来巴黎探望她的。波伏瓦的朋友博斯特夫妇接待了他，并给了他波伏瓦寓所的钥匙，将他安顿下来。阿格林与前妻复婚不久即再度离婚，后一直独居，过着怪癖的生活。这是事隔10年之后的重逢，阿格林在6个月的相聚中，一直希望能重温他与波伏瓦的爱情，但最终却不得不与波伏瓦分手。因为此时波伏瓦的心思已经放在比阿格林更重要的事务上，她不满足于自己已经取得的成就和荣誉。她深知阿格林会怨恨她，但她心意已决。她在心里默念道：“让巴黎的所有时钟，都来敲打我的心吧。”

阿格林走后不久，波伏瓦又和萨特等左翼知识分子投身到了阿尔及利亚的事件中。他们仍抗议政府在青年中征兵。当时法国一些知识分子发表了一份宣言书，支持青年拒绝应征入伍，支持士兵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拒绝服从命令的行动。波伏瓦、萨特和其他一百人在宣言上签了名，这篇《一百二十一人宣言》就发表在1960年8月出版的《现代》杂志上。波伏瓦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一直立场坚定。

1960年9月，波伏瓦和萨特应巴西作家乔治·亚马多邀请，去巴西宣讲古巴革命。在巴西之行中，波伏瓦应邀在里约热内卢大学做了一次关于妇女状况的报告。萨特也应邀作了关于阿尔及利亚和古巴的报告。波伏瓦在巴西圣保罗访问期间还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采访中她就有关《第二性》的问题，谈了自己对于当代妇女问题的看法。而萨特则谈了有关殖民主义制度、阿尔及利亚独立、古巴革命、巴西的现状等问题。在他们的巴西之访期间，法国国内的右翼分子为维护其殖民利益，扬言要枪毙萨特。11月，波伏瓦和萨特从巴西回国时，原以为政府要为《一百二十一人宣言》而指控他们，结果并未遭到控告。年底波伏瓦的回忆录《年富力强》出版并获成功。波伏瓦因她的政治立场和在国内外的声誉，成为了法国文化界引人瞩目的名人。1962年1月7日，波伏瓦因同

萨特一起反对1961年组建的秘密军队组织和阿尔及利亚战争，她的寓所被秘密军队组织炸毁。但波伏瓦仍不畏惧，1962年2月8日，她和《现代》杂志成员参加左派组织的一次反对秘密军队组织的示威游行，因而再次受到威胁。

1962年，波伏瓦和萨特应邀去苏联出席作协会议。1963年，她又和萨特前往莫斯科筹建国际作家联盟。这次会议后，他们受到了赫鲁晓夫的接见。赫鲁晓夫在接见他们时颂扬了社会主义并为苏联进兵布达佩斯作辩解。波伏瓦对赫鲁晓夫的辩解深表失望，返回巴黎后，她的第三部回忆录《事物的力量》又出版了。《事物的力量》主要描写波伏瓦从1944年到1962年这段期间的生活，在书中她讲叙了她为什么牺牲与纳尔逊·阿格林爱情的原因。波伏瓦认为这是出于她神圣的使命，即她与萨特共同的事业。

1963年11月和1964年5月，波伏瓦和萨特又应邀分别去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和苏联参加文化交流活动。她在这两次出访中，着重要探讨东西方文化的共处问题，这在当时是涉及到意识形态方面的较敏感的问题。在苏联，就这一方面的问题，她同与会的苏联作家们进行了探讨。在场的苏联作家们则同她的观点形成共识，认为应该为实现这种共处而努力。从苏联返回后，波伏瓦开始埋头撰写一部关于老

年问题的小说。1964年，萨特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波伏瓦和萨特都一致认为应不接受此大奖，以保持思想的独立性。对萨特的这种做法，当时法国报界的许多人都归罪于波伏瓦。

1965年7月，波伏瓦和萨特又来到苏联。这是他们在赫鲁晓夫下台后对苏联的再一次出访。访问间他们看到了苏联文坛上出现的一些转机，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等人的作品已经重新出版。然而就在他们出访后的第二年，这种转机又旋即消失。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两位作家被放逐到西伯利亚，1967年苏联坦克再次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波伏瓦对苏联的肃反运动扩大化和政治上的强权统治深表不满。她决定永远不去莫斯科了，要同苏联彻底决裂。

1966年，波伏瓦和萨特应日本出版商渡边先生和京都大学的邀请，到日本旅行讲学。在日本访问期间，波伏瓦对日本文学和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渡边先生特地邀请她和萨特观看了日本传统歌剧“能剧”。访问期间他们还游览了东京、京都和广岛，参观了寺庙、矿山和码头。此行中波伏瓦还特别留意到日本妇女的生存状况和社会处境。早在此次日本之行前，波伏瓦就闻知日本是个男权观念根深蒂固的国度。在这个国家里，妇女的社会地位非常低，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家庭里，妇女受轻视的现象严重。她在

码头，看到一个船舱里，一些妇女冒着呛人的尘埃，在一铲一铲地往货舱里装化肥。经与导游交谈得知，这些妇女每天工作八小时，每星期工作七天，不仅挣钱比男人少，而且还要料理各自的家务。她毫不掩饰地对导游感慨道，尽管她倡导妇女走向社会，争取自由独立，但眼前这一切，绝不是她所希望为妇女争取到的东西。在广岛，她和萨特与那些死里逃生的幸存者进行了交谈。从中她了解到，这些幸存者都像掩饰缺点一样掩饰自己的残疾，为了不愿成为丧失工作能力的废人。他们对他们的战后处境深表同情。当时在日本，反美情绪也很强烈，反美示威游行经常发生。10月16日，波伏瓦和萨特从日本返回巴黎。回到巴黎不久，她的最后一部中篇小说《美丽的幻象》出版了。这部书被列为当年的畅销书。波伏瓦在这本书中揭示了人们所面对的现实世界其实是一个用现代文明包装、掩饰的谎言世界、虚幻世界。这个世界给人们提供了逃避当前问题的理由。她在小说中谴责了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给人类造成的精神奴役。但后来波伏瓦又谈到，她并没有全盘否定技术进步，只是否定那些利用技术进步谋取私利的卑鄙行为。

1967年，埃及的《金字塔报》主编海卡尔邀请波伏瓦和萨特访问埃及。这颇像一次官员出访，因为埃及政府在波伏瓦和萨特抵达开罗后，为他们配备

了一架小型专机供他们使用。在访埃期间，他们一起参观游览了埃及的名胜古迹。但波伏瓦则尤其关注埃及妇女的社会境况问题。她与埃及的女记者、女律师、女医生一一取得了联系，请她们向她介绍一些有关妇女方面的问题。同时，波伏瓦还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无论在露天咖啡座，还是在正规的饭店餐馆里，人们从来见不到妇女的身影。波伏瓦对此表示了她的看法。在同新闻记者的谈话中，她谴责埃及人对待妇女的态度就像是封建主、殖民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在亚历山大大学作报告时，她大声呼吁男女平等，主张妇女要参予社会。她在《金字塔报》上还重申了自己关于妇女解放的观点。她重申工作是妇女解放的唯一手段。她也抨击了埃及人对妇女的歧视。在埃及这个穆斯林国家，波伏瓦的报告和讲话只受到了妇女们的欢迎，而男人们却对此仍表示有不同看法。他们引用《古兰经》对波伏瓦说，男女不平等早已写在《古兰经》上，所以男女不平等在埃及是宗教范围内的许可。波伏瓦谴责了这种宗教已经决定了妇女命运的古老观念。她告诉人们：“如果妇女不具备和男人一样的平等身分，那么任何社会主义都不可能存在。”这次访问中，埃及总统纳赛尔不仅为波伏瓦他们提供了各种方便，而且还在他们的旅程行将结束前在自己的赫利奥波利官邸接见了他们。萨特在与总统交谈时，

请求他能释放因重建共产党而被关押的 18 位埃及青年。纳赛尔答应了他的请求，释放了这些政治犯。波伏瓦和萨特在离开埃及前，还出席了纳赛尔为他们举行的隆重的告别宴会。埃及之行，他们已介入了具体的国际事务。

离开埃及后，波伏瓦和萨特又访问了以色列。一个以色列作家代表团接待了他们。以色列左翼政党的成员森哈·法拉邦给他们作了向导。波伏瓦和萨特特地去观看了以色列领土上的阿拉伯人居住区。他们尤其关注阿拉伯问题。在上述地区，波伏瓦发现以色列仍在对其领土上的阿拉伯人居住区和以色列犹太人居住区实行隔离，而且还发现这些地区的阿拉伯人的生活并未得到改善。此外，波伏瓦还尤其关注以色列妇女问题。她发现以色列妇女在建国后大都纷纷回归家庭，对此她深有感触。她认为以色列妇女在创建自己的国家时，曾拿起过铁锹甚至冲锋枪，甚至牺牲过生命，而如今却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去完成妇女的传统家务劳动，这实在不可思议。她由此感叹到，在以色列妇女已失去了和男人一样平等的地位。然而，以色列的妇女们却不这样认为，她们告诉波伏瓦：她们在社会中已经有了足够重要的地位，女权主义问题在以色列已经不存在了。波伏瓦对自己与以色列妇女之间，在有关妇女解放问题上存在着如此的差距而深感惊讶。

在访问以色列期间，波伏瓦和萨特还受到了以色列总理勒维·艾希克尔的接见。波伏瓦在此中东之行结束后，即写了三篇文章，这便是她后来发表的《疲惫的女人》。中东之行后不久，埃及战争爆发。当时在法国国内，人们分成了几派。戴高乐的支持者反对以色列。法国共产党也站在为埃及人提供武器的苏联人一边。托洛茨基派、马克思主义者及绝大部分的左派都支持埃及人民的反以斗争。而波伏瓦则出于对以色列的同情而为以色列人说话。她认为埃及有几千年的历史，因此它有相当大的生命力，即使战争失败，也会重新复活，而以色列则不同，如果战败了，则作为一个国家就不复存在了。她深为以色列担忧。

这12年的世界漫游是波伏瓦人生历程中的重要部分，因而必然给她以重大的影响。一方面，广泛的国际交往扩大了波伏瓦和萨特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而更重要的是它使波伏瓦开始用一种世界的眼光去看待问题，使她在观察不同国度、不同政体、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性别……各种不同问题时，都有了一种新的视角。正如她于1967年，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希伯莱大学所作的讲演中所说：“只有放眼世界，以世界为本，人们才能从根本上宽容别人，并推翻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主义以及各种各样的狂热主义。”

第十一章 最后岁月

1968年，新年伊始，波伏瓦的小说集《疲惫的女人》豪华版问世。这一年她正好60华诞。已是画家的妹妹海莱娜专为此书设计了别具特色的版画。新书的出版同样引起了轰动，短短八天内，数万册图书被抢购一空。然而对这一时期的波伏瓦来说，新作所引起的轰动效应已不再是什么奇闻了。

人们对波伏瓦的热情缘于她的声誉，更源于她的思想。此书一问世就再掀风波，而风波中之最有趣的是那些来自于四面八方的对她的声讨。其中有人高喊波伏瓦又向婚姻开刀了！波伏瓦本人在《疲惫的女人》一书出版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则谈到，此书的意义就在于向妻子挑战。因为妻子在家中是完全奉献于丈夫和孩子的，妻子最后注定要失败，最终会被抛弃。在即将结束采访时，她再一次强调其妇女必须工作的观点，她说：“我希望妇女像大家一样成为一个人类的存在……妇女只有通过工作、通过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才能真正显示出她们与社会、与他人的关系中的威力。”的确，在这本书中，人们确实感受到了波伏瓦身为女性，而对女性自身利益问题的关心，体验到年暮的波

伏瓦再一次苦口婆心地开启女性心智和情感，也体会到临高的波伏瓦对身后那些仍不觉悟、不肯尝试、继续步陈规的女性的忧虑和无奈。在此她只有发出振聋发聩的恫吓，以尽其心。然而一生的经历使她知道，此书的出版尽管能赢来喝彩，但只会落得呼而不应。因为传统观念、社会习俗已浸透人们的肌髓，摒弃它们绝非易事。然而波伏瓦的个性中却只能找到“向前”二字。

1968年，已发表了《疲惫的女人》一书的波伏瓦并未感到自己已是疲惫的女人，她仍不改其介入社会的志向。该年3月23日，巴黎知识分子举行了“声援越南日”活动，波伏瓦在凡尔赛宫前参加了这一活动。此后不久，因四名反对越战的中学生遭政府的逮捕，巴黎爆发了“五月学生运动”，即“五月风暴”。波伏瓦为了支持学生的行动，主动介入学生运动。5月8日、9日，波伏瓦、萨特和巴黎其他一些知识分子先后发表声明和宣言，在声明、宣言中表明了他们要支持学生运动的态度。在学生运动爆发期间，波伏瓦奔走出入于大学校园，关注事态的变化，声援学生的行动。她甚至希望学生运动能转变为革命或起义，从而推翻现存体制。5月底学生运动遭军警弹压。她和萨特等知识分子愤怒谴责政府的做法。学生运动结束后，波伏瓦在《现代》杂志上开辟了一个专栏，

专门探讨巴黎“五月风暴”失败的原因。在对阿尔及利亚独立和美国出兵越南两个问题上，波伏瓦立场始终是坚定的。

1969年4月，法国举行总统大选。戴高乐将军和弗朗索瓦·密特朗参加竞选。波伏瓦对这次大选不感兴趣，因为政府的种种举措已使她失去对其的信任。她弃权投票。但此后她又在萨特、科莱特、玛格丽特·杜拉斯、米歇尔·雷利斯等人发起的支持法国托洛茨基派运动领导人阿兰·克利维竞选总统的声明上签了名。

1969年夏，波伏瓦到诺安特凭吊了乔治·桑的故居。这貌似偶然的举动却是这位年逾六旬的老人对精神家园的探寻，是她多年来的一桩心愿。一百多年前，乔治·桑以其非凡的魄力和勇气摒弃了她的阶级和道德，只身带着两个孩子闯荡巴黎，走上了对抗世俗偏见、追求人格独立和个性自由的道路。她带来了骇世惊俗的精神和观念，带去了无限的自豪和遗憾，留下了无数的感慨和赞叹。在此凭吊涌起了波伏瓦怀旧恋故之情，也唤起了她对乔治·桑的深深怀念。相似的经历和追求在历史和现实的交叉点上撞击、共鸣。在忆古抚今中她感叹世事的变迁和流逝的岁月。

回到巴黎后，波伏瓦一直沉浸在这种对乔治·桑的缅怀中，直到年底与萨特在罗马会合时，她才从这

种感伤的情怀中解脱出来。

1970年，波伏瓦的论著《老年》由伽里玛出版社出版。在这部论著中，她以自身的经历和她所采访收集的社会收容所、退休养老院及其他老人的生活材料为依据，探讨了现代社会中老年人的社会处境问题。她认为衰老是一种身心现象和自然规律，所有人都要步入老年。然而现在的专家治国的社会却排斥老人，过早地剥夺其参加社会活动的机会，而促使其衰老，摧毁他们身心。她以老年人的名义向社会呼吁，停止牺牲老人利益，帮助他们回归社会生活，在城市中给老人以受尊重的地位。《老年》一书的出版，再次引起社会反响，尤其在美国引起强烈的反响和轰动。为此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还特约采访了波伏瓦。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责了社会是造成老年人不公平的境遇的主要责任者。在回答法国《新观察家》杂志的记者采访时，波伏瓦又提出了其解决老年人问题的设想：要使老人融于城市生活。在关于老人境况的问题上，波伏瓦表现了她在妇女问题上同样的态度，她在为所有人的权益而奋斗。波伏瓦对老年人问题的关注，得到了许多国家里老年人的理解和响应。在美国，老年人努力将波伏瓦的设想付诸于实践。他们组建老人协会“灰色美洲豹”，该组织的宗旨就是使老年人融入都市生活。此外，为改善退休老人们的待遇，

协会还创办了一些企业。

1970年4月，巴黎左派报纸《人民事业报》负责人勒·当戴克和勒·布里斯相继被捕。报纸也因被控宣传革命暴力思想而遭查封。报社主编向萨特求援，萨特出于同情他们的主张而同意自第20期起接任社长。萨特和波伏瓦还为勒·当戴克和勒·布里斯出庭作证，从而使《人民事业报》继续办了下去。然而6月20日警察逮捕了出售《人民事业报》的报商，此举激怒了萨特。于是萨特于6月20日至26日亲自上街叫卖报纸，受警方拘禁质询，但随即释放。波伏瓦在此事件中。一直支持萨特这一为捍卫新闻自由的正义行动。她亦为此而奔走呼喊，亦同萨特上街卖报。而她本身也为争取新闻自由而独立作战。她临危接任另一份受到威胁的左翼报纸《国际傻瓜》报的主编职务，以挽救该报。10月19日，《国际傻瓜》原主编让·埃登·哈利耶被捕。波伏瓦即在《世界报》上发表声明：“我们切不可上当受骗：政权只宽容那些对它有利的新闻，它拒绝把播散新闻的权力给那些揭示大众苦难和反抗的报纸。不管政权如何施威，追捕，我还要和我们《国际傻瓜》的同仁团结战斗，争取新闻自由，继续为自由而战。”1971年1月26日，她和莱利一道主持群众集会，宣传新闻自由的主张。

1972年，波伏瓦的回忆录第四卷《了结一切》出版。该回忆录主要记述了她自1962年至1972年这段期间的生活。在书中，波伏瓦暗含打算弃笔、退隐之意。她在该书后记中提道：“在我的读者中，我结交了大量的朋友，我不再有其他奢望。”然而波伏瓦自其出版《第二性》起，就已将她个人的事业融入了整个妇女解放事业中，融入公众的社会生活中。妇女社会需要她，整个社会生活需要她。这种事业上的水乳交融，已使她欲罢不能。

1972年，法国巴黎的两位女权主义运动领导人阿娜·塞林斯基和克丽丝蒂娜·戴尔菲在全国发起了妇女解放运动。她们十分渴望波伏瓦能参加她们的运动并给予她们支持。由于她本人一贯主张介入社会，反对社会对妇女的性别歧视，因此波伏瓦应她们的请求痛快地在她们的《女权运动宣言书》上签了字。波伏瓦还积极地参加她们组织的妇女解放运动示威游行。1972年6月，她还和女权主义运动的这两位领导人及法兰西学士院的让·罗斯丹一道共同创建了选择协会，波伏瓦任协会主席。该协会的宗旨是：1 使避孕自由化、完全化和免费化。2 争取消除所有与流产堕胎有关的压抑性文章。3 免费保护并帮助所有被控堕胎或与之有牵连的人。6月15日，选择协会还向国民议会提出了一个自由堕胎法草案，并且还

提出要求承担所有堕胎案的审理。在同年11月的鲍比尼案中，波伏瓦为这个少女因堕胎而被指控一案作辩护。她谴责法律的不公正，强调政府设置性教育专业的必要性。波伏瓦在1972年已逐渐认识到，要真正实现妇女平等不能仅靠舆论宣传，而必须通过实际的斗争。她认为妇女的解放必须伴随一次深刻的革命。这种革命就是向男性统治的社会进行真正的硬碰硬的斗争，包括运用暴力的手段。因为男人总是尽其所能地利用父系社会给他们带来的优势，并努力使之持续下去。男人可以攻击女人，凌辱她们，殴打她们，甚至还受法律庇护。妇女不通过暴力手段则难以实现解放。波伏瓦曾明确地表示她赞成创办各种柔道、武术班来培训妇女。因此以暴力回敬暴力的主张是波伏瓦的女权主义激进思想的主要表现。要斗争只有靠妇女自身，只有自觉的斗争才能改变社会。二十多年前她曾在《第二性》中提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变成的。”而现在她强调，应该在这句话后再加一句：“男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既然男女性别差别都是社会造成的，这已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文化事实，那么重新去改变这种状况，也是有可能的。

1974年是《第二性》发表25周年，法国为此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世界许多国家也纷纷以不同形式予以响应。在法国，许多报刊均刊登出纪念文

章，有关的讨论会也纷纷举行。波伏瓦高兴地接受了电视台的邀请，第一次在电视上与她的读者、观众和支持者见面。经过一生的艰辛努力和不懈奋斗，波伏瓦以及她为之终生奋斗的妇女解放事业终于得到了全国公众的普遍拥护，终于得到了世界范围的承认和支持。

1975年，萨特已行动不便、视力衰竭。这位70高龄的伟人已步入自己最后的时光。波伏瓦这时几乎终日陪伴于他身边，照顾他的日常生活。萨特这位一生不习惯于依赖别人的强者，此时流露出对波伏瓦这位共度一生的伴侣的依恋。由于萨特视力衰退，无法写作，波伏瓦便根据他的口述记述他想说的话和与别人的谈话。从1975年至1980年，波伏瓦自己几乎停笔了，她把主要时间和精力用在帮助萨特笔录他的口述文章。此外，她还忙于《现代》杂志的编辑工作。1980年4月15日，萨特因肺气肿死于勃鲁塞医院。萨特之死给波伏瓦带来了无限的痛苦，注视着这位与她相伴半个世纪的终生伴侣，她感到整个世界包括她自己都被他带走了。波伏瓦回忆当时萨特逝世时的情景时说：“……我想钻进被单躺在他身旁。”但不久，她摆脱了萨特之死带给她的痛苦。她说：“永远不要指望别人，要靠自己。如果我无所事事，什么也不干，我自己就一文不值了。”

萨特去世后，波伏瓦又完成了两本书，短篇小说集《何时超凡》和论著《告别的仪式》。《告别的仪式》主要反映了萨特晚期的生活情况。作品真实、细致地记述了萨特在这一时期的思想、情感及风烛残年中的日常生活。该书出版后，波伏瓦再次受到了强烈的攻击。一些读者指责她不该表现萨特的风烛残年，谴责她亵渎了一个伟人神圣的形象。而波伏瓦已不再理会舆论的是与非，她在自己一生的最后岁月中埋头整理让·保尔·萨特的遗著。她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我想这是一个有关艺术作品的特殊观念的问题，应该把萨特的艺术作品看作是一个完整的小花园，它是理解其他东西的中介。我们应当问一下为什么在这儿而不是在那儿种这些花。”在自己的最后岁月，波伏瓦觉得她有责任给公众一个萨特的真实形象。这是她对萨特，对读者，以及对她自己的最后责任。

1986年4月14日，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杰出的女权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瓦辞别了人世，终年78岁。法国政府为波伏瓦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密特朗政府派了四位要员出席了葬礼。人们把波伏瓦葬于蒙巴那斯公墓，紧挨着让·保尔萨特的墓地。